南唐中主的政績與文化建設

陳葆真
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前言

南唐國祚短促，前後只有三十八年（937～975），其間歷經三主：烈祖（937～943）、中主（943～961）、和後主（961～975）。史家對以上三主的研究以後主最多，烈祖次之，而對中主殊少研論。然而中主卻是相當值得注意的，因爲他統治南唐的時間最長，對南唐的政治和文化影響也最深。南唐在他治下的十九年間，國勢由鼎盛而驟衰：國土由烈祖時的三十州擴張爲三十五州，疆域北抵淮河流域，南達漳、泉地區。中主也曾因而野心勃勃，甚至有一統中原的雄心。但是旋踵之間，卻又因抗拒後周失利而喪土辱國：不但儘失江北十四州之地使國土喪失幾達一半，同時又被迫稱臣納貢，國內財政也因而產生危機，中主也在遷都南昌不久，鬱鬱以終。① 這是中主在政治上失敗的一面，而導致這個失敗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包括了中主個性的文懦，他的用人失當，以及採用政策的錯誤等等。

然而，不以成敗論英雄，則中主對南唐文化建設的貢獻卻是不容忽視的。以個人修養而言，中主是一個謙謙君子：他崇儒好佛，以身作則；擅長詩詞，獎勵文風；興辦學校，開設貢舉，以培育人才；又妙解音律、長於書法、並支持繪畫活動。在他領導與影響之下，南唐文風之盛遠超過四周諸國，在文化史上寫下了璀璨的一頁。以下本文作者擬就史實所見，分別針對

---

① 有關南唐疆域的變化，參見馬令，《南唐書》，四部叢刊，冊12（台北：商務印書館），卷30，頁112～114，〈建國譜〉。又，周在浚，《南唐書注》（18世紀初年，嘉業堂刻本），冊4，附錄，頁16b～18b中列出南唐版圖爲：江北十三州，包括揚、楚、泗、和、滁、光、黃、蘄、廬、壽、海、濠；江南十五州，包括昇、潤、常、歙、宣、鄂、池、饒、信、江、洪、撫、袁、吉、虔；及南方七州，包括泰、筠、汀、建、漳、泉、劍等共三十五州。

以上所提出的幾個論點，來探討中主在政治和文化兩方面的失敗與貢獻。

一、中主的政績

南唐烈祖卒於昇元七年（943）二月。皇太子李璟繼位，是爲中主。②中主於同年改元保大。③ 雖然熟習典章的韓熙載（908～970）以爲這不合古法而反對，但中主因爲詔命既出，不便更動。中主統治南唐十九年（943～961），期間用過三個年號：保大（共15年，943～957）、中興和交泰（同爲958）；後來因爲被後周打敗而自去國號，奉周正朔（顯德五～六年，958～959）；北宋代後周之後，又奉北宋年號建隆（元～二年，960～961）。中主所統治的這十九年間是南唐國勢由隆盛而衰替的關鍵時期。其所以如此，自有外在的因素，比如北方强敵的欺凌。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卻來自南唐本身內政上的問題。依我的觀察，中主治下南唐內政的弊端可歸納爲以下的三點：1.中主個性猶疑懦弱，缺乏主見；2.用人不當：文臣結黨營私，縱樂奢糜；武人好大喜功，輕舉妄動；3.軍事、外交政策錯誤。這三個不利的條件同時運作，惡性循環的結果，造成朝政敗壞、戰爭連年、國庫匱乏，終使北方的後周在明主世宗的領導之下，力挫南唐，逼使中主割地稱臣、納貢求和、去國號、奉正朔、受盡曲辱。而當宋太祖取代後周自立之後，中主更因畏懼强敵南渡，而從金陵遷都到南昌，又因每日怊悵不樂而終於客死他鄉。這使得南唐烈祖畢生辛苦所奠定下來的豐厚基礎，在短短不到二十年之間，霍然瓦解於一旦。以下我將就上述問題分項論述。

1. 中主個性猶疑懦弱、缺乏主見

中主在唐昭宗天祐十三年（916）出生於江寧（南京）。那時他的父親（烈祖李昇當時名爲徐知誥）二十九歲，仕於吳國，被任命爲昇州刺史。④

② 馬令，《南唐書》，卷2，頁11；陸游，《南唐書》，四部叢刊本，卷2，頁9。

③ 近代學者唐圭璋以爲「保大」，應作「保太」才是。他所根據的是1950～51年在南京牛首山出土的烈祖陵墓內的哀册，那上面的中主年號寫作「保太」。參見曾昭燏等人編，《南唐二陵發掘報告》（南京：文物出版社，1957），頁82～90。

④ 關於烈祖的研究，參見諸葛計編，《南唐先主李昇年譜》（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又參見陳葆真，〈南唐烈祖的個性和文藝活動〉，《美術史研究集刊》，2期（1995），頁27～46。

他的母親宋氏原爲他的義祖徐溫（徐知誥養父）的侍姬。知誥原配過世後，徐溫將她指配給知誥作爲繼室。宋氏後來生有四子：依次爲景通（璟，中主）、景遷、景遂、和景達。⑤ 徐知誥自小失怙，八歲爲徐溫收養，從小隨徐溫轉戰南北，成長於兵戎之間，出生入死，辛苦倍嚐，因此個性極爲剛烈急燥。後來雖然貴爲南唐之君，但是他的生活勤勞節儉，對子女的教育嚴格而講求實效。⑥ 在這種環境之下，中主個性的發展自然受到了相當大的影響。

中主的本性柔弱，加上他的生長環境優沃，倍受父母呵護，與烈祖艱辛的成長過程完全不同，因此養成他緩和而從容的個性。但是身爲長子的他卻從小承受極大的壓力，因爲他必須常常面對一個英明剛烈，又具無上權威的父親嚴厲的教導與殷切的期盼。而他的弟弟之中，特別是二弟景遷和四弟景達更是才貌出衆，十分得到父親的鍾愛，對他在心理上也造成相當大的威脅。加上他必得認定終將承擔一國大政的事實，這些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壓力與責任，對一個柔弱的人來說，實是過重的負荷。這種種原因養成他猶疑、逃避、無法面對困難，事前缺乏主見，事後又容易反悔遷怒的毛病。這些個性上的缺點一部份由於天性，一部份又與他的生長環境有關，正是作爲政治家的致命傷，中主不幸兼而有之。以如此文弱的個性要領導朝中一些與烈祖共同打過天下的老臣已非易事，何況當時南唐四周强敵環伺：北方相繼有後漢、後周、與北宋，而東南則有世仇吳越。如此，想要長保太平自是相當艱難，而更況中主又不幸輕信朝臣慫恿而輕啟戰禍：南攻福建，西取湖南，弄得國庫匱乏。更糟的是，他又因兵援淮北的後周叛將李彥貞，以致引起了後周和吳越的夾擊，最後弄得割地遷都，一蹶不振。中主既無自知之明，更乏謀略，與他父親的審知與知人善任完全不同。難怪南唐在他統治期間會驟然中衰。以下，我們來看中主的生長環境對他個性的影響，以及他即位後種種逃避、猶疑、與反覆的事實。

中主的個性溫文儒雅，外表精彩如玉，望似神仙，遠近聞名。《釣磯立談》上有一則記載：

⑤ 參見龍袞，《江南野史》，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影印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本，1983），册464，頁71；馬令，《南唐書》，卷6，頁7；陸游，《南唐書》，列傳卷13，頁72。又參見夏承燾，《南唐二主年譜》（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1955年版），頁13；又，據陳彭年，《江南別錄》，四庫全書，册464，頁124，以爲景遷出於種氏，但陸游《南唐書》，列傳卷13，頁72，種氏傳載種氏生景遷，陳彭年所記有誤。

⑥ 同注④。

臺灣大學藝術 期刊資料庫

元宗神彩精粹，詞旨清暢，臨朝之際，曲盡姿致。湖南嘗遣廖法正將聘，既還，語人曰：「汝未識東朝官家，其爲人粹若琢玉，南嶽真君恐未如也！」⑦

龍袞的《江南野史》也說他：「音容閑雅，眉目若畫。」⑧ 馬令的《南唐書》也說中主：「美容止，器宇高邁，性寬仁，有文學……」⑨ 吳任臣的《十國春秋》也說他：「風度高秀，工屬文，音容閑好，讀書能詩。」⑩ 當時的畫家周文矩曾爲他作過一些生活畫。廬山的圓通寺在宋代還藏有中主的畫像，王明清的祖父爲九江牧時，曾收過一件摹本。⑪ 這些畫像可惜都已不存。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有一件傳爲周文矩所作的《重屏會棋圖》（圖1），描寫中主與諸弟下棋的情況。此圖原件在南宋時，曾經樓大防收藏，王明清也曾見過。今本根據單國强先生的看法，認爲是宋人摹本。⑫

因爲中主清秀儒雅，極得人緣。當時吳國君主楊溥也十分欣賞他，以爲「朕諸子皆不及也」，因此，任他爲尚書郎。⑬ 這當然是靠他父親徐知誥和義祖徐溫兩人威重吳國的庇蔭，因爲當時的中主才不過十歲左右。義祖徐溫對中主非常喜愛，認爲：「諸孫中，此子特貴」，因而爲他娶鍾章之女爲妻。⑭ 中主的天性閑雅好靜，喜歡文學、藝術、和音樂。他曾於十五歲（930）左右，在廬山瀑布前修築讀書台，希望作爲將來退休養老之所。⑮

⑦ 無名氏，《釣磯立談》，四庫全書，冊464，頁54。類似記載又見於陳彭年，《江南別錄》，頁126。
⑧ 龍袞，《江南野史》，頁81。
⑨ 馬令，《南唐書》，卷2，頁11。
⑩ 吳任臣，《十國春秋》（康熙八年，1670序）（台北：國光書局影印，無出版年月），卷16，頁6b，27。
⑪ 見王明清，《揮麈三錄》，四庫全書，冊1038，卷3，頁565。
⑫ 原件情況，參見王明清《揮麈三錄》，同上注。又，單國强的看法，參見《中國美術全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繪畫編，冊2，頁120，圖61，說明33。
⑬ 陳彭年，《江南別錄》，頁124；又，吳任臣，《十國春秋》，卷16，頁1a，以爲此時中主官拜駕部郎中，而非尚書郎。
⑭ 陳彭年，《江南別錄》，頁124。
⑮ 鄭文寶，《江表志》，四庫全書，冊464，卷2，頁135；馬令，《南唐書》，卷4，頁21；陸游，《南唐書》，卷2，頁14；吳任臣，《十國春秋》，卷16，頁27；夏承燾，《南唐二主年譜》，頁17。

中主個性寬和，友愛兄弟。對於政治，他的態度消極退讓，完全沒有爭奪皇位的雄心。但是朝中的野心人士，卻各爲私心，暗中醞釀奪嫡的行動。這使得中主通往執政的路上，充滿變數，其中比較明顯的行動有四：

首先是烈祖的謀臣宋齊丘，他支持中主的二弟景遷。景遷才幹出衆，爲吳王女婿，極得烈祖喜愛。宋齊丘企圖擁護他爲皇太子，將來自己可以功臣掌權，於是安排他的黨羽陳覺作爲景遷的教授。一方面又常在烈祖面前詆毀中主，期望烈祖易儲。可是這陰謀被烈祖發覺，因此計不得逞。⑯ 後來因爲景遷早卒（937），這項陰謀便自然停止。

其次是烈祖的愛姬種夫人，她想爲自己的兒子景遏爭奪嗣子之位。種夫人甚得烈祖專寵。有一次，她趁烈主怒責中主之後，向烈祖進言：「景遏之才可代爲嗣」。但是，烈祖聽後勃然作色，以爲「國家大計，女子何預？」立刻將種夫人休掉，並命她出家爲尼。⑰

再其次是烈祖本身的矛盾。他自己十分喜愛四子景達，因爲景達「神觀爽邁，異於他兒」，所以很想立他爲嗣。但終因礙於立嫡長的傳統觀念而未付諸實行，最後在昇元四年（940）還是立了中主爲皇太子。⑱ 雖則如此，到最後關頭，還有朝臣想限制中主的權限：當昇元七年（943），烈祖去世之時，中書侍郎孫晟等人還想假造烈祖遺詔，要以中主的生母宋后爲監國。但是，翰林學士李夷鄴以爲：

此非先旨，必姦人所爲。大行常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爲亡國之計？若遂宣行，吾對百寮裂之必矣！⑲

⑯ 此事見宋齊丘傳，見馬令，《南唐書》，卷20，頁80；又《通鑑考異》，卷30，引徐鉉，《江南錄》，文載於夏承燾，《南唐二主年譜》，頁18～19；又，陳彭年，《江南別錄》，頁124，卻以爲景遷曾先娶李德明之女爲妻。
⑰ 事見馬令，《南唐書》，卷6，頁27；陸游，《南唐書》，列傳卷13，頁72。又見陳彭年，《江南別錄》，頁124。但陳彭年以爲種氏爲景遷之母，夏承燾已辨誤，見《南唐二主年譜》，頁13。
⑱ 馬令，《南唐書》，卷7，頁34；陸游，《南唐書》，列傳卷13，頁75。
⑲ 事見鄭文寶，《江表志》，卷2，頁137；陳彭年，《江南別錄》，頁124；馬令，《南唐書》，卷10，頁47，李夷鄴傳；陸游，《南唐書》，列傳卷12，頁68，李貽業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李夷鄴所說的，的確是烈祖的爲政態度。因爲烈祖在即位後第二年（938），便明白表示「……不以外戚輔政；宦官不得預事。」⑳ 這是南唐朝臣所共知的規範。因此，孫晟的假造遺命，被李夷鄴揭穿而不得逞，中主才得以順利即位。

這些事實明顯反映了中主從一開始便未能贏得群臣對他的支持，因此，連以嫡長皇嗣子登基一事，也如此的坎坷崎嶇。這當然與他個性太過溫文懦弱，欠缺領導才能、無法服衆有關。撇開上述的各個陰謀家如宋齊丘等人不說，連素來謙退淡泊的老臣李建勳，也看到中主個性中的缺點。鄭文寶的《江表志》中有一段記載，顯示李建勳對中主個性缺點了解的透澈，以及他心中的隱憂：

> 元宗（中主）嗣位，李建勳出師臨川。將行，謂所親曰：「今主上寬仁廣大之度，比於先帝遠矣！但質性未定，左右獻替，須得方正之士，若於目前所覩，終恐不守正業。」㉑

李建勳、宋齊丘、和孫晟三人都曾是烈祖的宰相。他們豐富的人生閱歷，使他們意識到中主能力不足以擔當國政。宋、孫二人雖曾設法阻撓，但未成功。李建勳也只有擔憂而別無他法。證諸於後來南唐所遭遇到的不幸，更可見這些老臣確有先見之明。但是，他們也只能如徐鉉在南唐亡國後，爲後主所作的墓誌銘中所哀歎的：這一切都是天命吧！

總之，由於天性文弱，無意爭取，再加上周遭環境對他的敵意，這使得中主對於本身的角色和權力缺乏信心，因而常有退讓逃避、舉棋不定、反覆變化的舉動。最明顯的是他在昇元三年和四年之間，兩次謙讓推辭皇太子之位，但爲烈祖所嘉許而留位。他就在即位之時，也表示希望由他的弟弟們繼位。這事被中書令徐玠所阻止才作罷：

> 烈祖殂，〔中主〕遜於諸弟，詞旨堅固。中書令徐玠以袞冕衣之，曰：「大行陛下以神器之重畀陛下。陛下固守小節，非所以尊先旨、

⑳ 司馬光以爲這是當時各國所比不上的明智措施。見《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校印本，1969），冊15，卷282，頁9197～9198。

㉑ 鄭文寶，《江表志》，卷2，頁139。又見馬令，《南唐書》，卷10，頁44～45，李建勳傳。但此事未載於中主本傳。

承孝道也。」乃嗣位。㉒

就是即位後，中主還是不能坦然。半年後（保大元年七月，943），他又詔告中外以兄弟傳國之意，並在他父親靈柩之前，約以兄弟世世繼立。這種舉動被另一老臣蕭儼勸阻，但中主不聽。㉓ 這樣由於皇位非必由嫡子繼承，因此造成中主的皇子弘冀對皇叔景遂的敵意，後來造成弘冀酖殺景遂的悲劇。㉔ 這是中主始料未及的。

更荒唐的是，中主在第二年又下詔：以景遂（當時封齊王）總攬庶政。自己則退居宮中。除副樞密使魏岑和查文徽之外，其他人非召對不見。宰相宋齊丘和蕭儼勸他，他也不聽，乾脆把宋齊丘貶爲潤州節度使。後來經賈崇叩閽泣諫，他才改變主意，恢復視政。他的用意是想將權力交給弟弟景遂，再傳給景達，以完成烈祖本來有意傳位給景達的願望。㉕ 但是，他也順便趁機將權臣宋齊丘下放。因爲中主對宋齊丘當年爲了支持景遷而陰謀阻擋他當嗣子的舊恨，不致於忘記。但如此迂迴費勁的作事，雖可顯示了中主的仁厚，但卻更顯見他缺乏作爲一個政治人物所應具有的魄力。

無論如何，中主好不容易認定了他身爲皇帝的角色，開始運用他的權力，要有所作爲了。但不幸的是，他缺乏知人善任的本事。又因爲個性寬厚，多感情用事，聽任親信，易爲佞言所惑。用人不當的結果，弄得朝政不堪收拾，這是中主內政的第二弊端，具見下面論述。

2. 中主用人不當：文臣結黨營私，武將好大喜功

A. 文臣結黨營私

中主朝中的基本成員分爲兩部份：一爲前朝重臣，如宋齊丘、周宗、孫晟、李建勳、和陳覺等人；二爲中主的親信新貴，如馮延巳、馮延魯兄弟、魏岑、和查文徽等人。舊臣之首的宋齊丘一直是烈祖的重要參謀和建國功

㉒ 陳彭年，《江南別錄》，頁125。

㉓ 馬令，《南唐書》，卷2，頁9；陸游，《南唐書》，卷2，頁9；卷13，弘冀傳，頁76。

㉔ 見鄭文寶，《江表志》，卷2，頁140。又弘冀毒殺景遂事，馬令和陸游在弘冀傳中不載。但陸游在《南唐書》，列傳卷13，頁74，景遂傳中錄有此事。馬令則略而不錄。

㉕ 見龍袞，《江南野史》，卷2，頁74；馬令，《南唐書》，卷2，頁11；陸游，《南唐書》，卷2，頁9。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臣，但因曾反對中主爲皇嗣，而在中主即位後，一度被貶。後來，宋齊丘與中主關係修好，回朝專權，積極擴張自己的勢力。他結交馮延巳、馮延魯、查文徽、陳覺、和魏岑等人（當時人稱他們爲「五鬼」），共同結黨營私，排斥他人。㉖

新貴又以馮延巳爲代表。馮延巳（903～960）比中主年長十三歲，年少而博學，有文才。烈祖命他陪侍年輕的中主。兩人趣味相投，都擅長詩、詞、書法。基於這份由年輕時代便建立起來的交情，中主即位後便提拔他爲宰相。㉗ 馮延巳有才而無行，因此，同爲宰相的孫晟和蕭儼都恥於與他爲伍，公然譏刺他：「金碗玉杯而盛狗屎，可乎？」㉘ 馮延巳好爲浮誇，薄矜己才，曾與烈祖辯論南唐用兵之策，烈祖不聽他的意見，而以弭兵富國爲要。㉙ 中主即位後，馮延巳乘俾進言，以烈祖偃兵休武爲「齪齪無大略」的「田舍翁所爲」，㉚ 因此慫恿中主興兵建功。其他佞幸之臣也急於建功謀利，因此也附和進言，而中主也就冒然聽從，導致兵無息日，兼使國庫匱乏。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中有如下的一段評論：

> 唐主性和柔，好文章，而喜人佞己，由是諂諛之臣多進用。政事日亂，既克建州、破湖南、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爲之出師，遙爲聲援。又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值中國多事，未暇與之校……㉛

《釣磯立談》也感歎地說：

㉖ 見無名氏，《釣磯立談》，頁57；宋齊丘傳，見馬令，《南唐書》，卷20，頁79～82；「五鬼」之傳，見同書，卷21，頁82～86；又宋齊丘傳見，陸游，《南唐書》，列傳，卷1，頁19～22；查文徽傳，見卷2，頁24～25；陳覺傳，見卷6，頁42～43；馮延巳、延魯傳，見卷8，頁49～52；魏岑傳，見卷12，頁71～72。

㉗ 馮延巳傳，見馬令，《南唐書》，卷21，頁83～84；陸游，《南唐書》，列傳卷8，頁49～50；馮著有《陽春集》，最先由他外孫陳世脩在北宋嘉祐三年（1058）編印；他的年譜，詳見夏承燾，《重校陽春集》，附於王次聰，《南唐二主詞校注》（台北：世界書局，1965）之後。

㉘ 見馬令，《南唐書》，卷16，頁68，孫晟傳；又見，陸游，《南唐書》，列傳8，頁49。

㉙ 兩人論辯用兵之策，見無名氏，《釣磯立談》，頁51～53。

㉚ 無名氏，《釣磯立談》，頁53。

㉛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92，頁9532，後周太祖顯德元年（954）事。其中所言中主北援後漢在山東的叛將李守貞和慕容彥超事，見同書卷288，及卷290。

> 〔中主〕是時承烈祖勤儉之後，國家富給，群臣操觚管小伎，侍從左右，乘間納邪說，多自謂：「國勢崇盛如舉太山以壓朽壤，盪定之期，指日可俟。會閩、荊兄弟爭國，有釁可乘。上亦昧於幾先，熒惑利口，於是連兵十許年，國削民乏，渺然視太平之象，更若捕風繫影。㉜

中主對馮延巳之所以言聽計從，乃因馮具有絕佳的口才。據《釣磯立談》所載：

> 叟聞長老說馮延巳之爲人，亦有可喜處。其學問淵博，文章穎發，辨說縱橫，如傾懸河暴，而聽之不覺膝席之屢前，使人忘寢與食。但所養不厚，急於功名，持頤竪頰，先意希旨，有如脂膩，其入人肌理也，習久而不自覺。卒使烈祖之業，委靡而不立……㉝

與這批人對立的另一批文臣，包括孫晟、常夢錫、蕭儼、韓熙載、江文蔚、鍾謨、和李德明等人。㉞ 對於弄權的佞臣，他們首先在私下勸阻，希望以此挽救弊政，如孫晟和韓熙載就曾私下勸諫宰相宋齊丘避免徇私用人。但宋齊丘拒絕不聽。㉟ 後來這些人便只好與弄權者公然抗爭，譬如保大五年（947），馮延魯和陳覺在伐閩之役中，由於不遵詔命，自行出兵攻閩兵，引起吳越和閩兵聯合反擊而大敗之時，韓熙載便公然上疏，要求殺二人以正法紀。但中主包庇二人，從輕發落。韓卻因此被黜放。㊱

在中主徇私包庇，佞幸弄權，排除異己之下，南唐朝政日壞。更糟的是，朝中文臣，不論何黨何派，都追求奢靡的生活。聲色伎樂，成爲一時風尚。這與烈祖時的淳樸風氣完全相反。烈祖本人生活節儉。㊲ 又因烈祖出

㉜ 無名氏，《釣磯立談》，頁54。

㉝ 無名氏，《釣磯立談》，頁54。

㉞ 這些人的傳記分別參見馬令，《南唐書》，卷10，頁45（常夢錫）；卷13，頁56～57（韓熙載）；卷13，頁57～58（江文蔚）；卷16，頁68（孫晟）；卷19，頁76～79（李德明及鍾謨）；卷23，頁87（蕭儼）。

㉟ 事載於無名氏，《釣磯立談》，頁64～65。

㊱ 此事載於無名氏，《釣磯立談》，頁54；又見馬令，《南唐書》，卷13，頁56，及陸游，《南唐書》，卷9，頁55，韓熙載本傳。

㊲ 關於烈祖的個性和生活，參見注④。

臺灣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期刊資料庫

身貧寒，爲人養子，深感貧困者骨肉分離的痛苦，因此，明令「禁壓良爲賤，令買奴婢者，通官作券。」㊳ 希望透過政府的登錄，控制民間隨意買賣奴婢的行爲。他對於聲色伎樂之事更不能縱容。烈祖在年輕還未建國時曾因金陵常有水火之災，而說：「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因而「悉縱遣侍妓。取樂器焚之。」㊴ 因此，像韓熙載那種雖有文才而生活放蕩的人，他始終不予重用。㊵ 而他的重臣，由於多曾共體時艱，因而多半安份，頂多不過如貪財而富有的周宗：雖然「貲產巨億」，但是「儉嗇愈甚」，因此「論者鄙之」。㊶ 可以說，烈祖時代，君臣多具危機意識，上下勵精圖治，風氣樸實。才能累積數量龐大的財帛和軍器藏在德昌宮，遺留給中主。㊷ 。雖然中主本身也「奢儉得中」，㊸ 但是，他卻未能遏止臣下那種種奢侈、放盪、以及貪污的惡習。以下我們透過一些例子，來看中主時代南唐社會風氣之奢靡。

首先是老宰相孫晟的廣置妓妾，生活糜爛：

> 〔孫晟〕事烈祖、元宗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台盤」，時人多效之。㊹

也有官員監守自盜，貪污舞弊，廣蓄伎樂，生活荒淫的，如德昌宮使劉承勳：

> ……南唐自吳建國，保有江淮，籠山澤之利，帑藏頗盈，德昌宮其外府也，金帛泉貨多在焉。禪代之後，邦國新造，而簿籍淆亂，鈎校不明。承勳由是多入私家，盜用無算。家畜妓樂迨百數人，每置一妓，費數百緡，而珠金服飾亦各稱此。承勳善爲詭佞，常以寶貨遺賂權要，故雖朱門甲第，窮極富侈，而久弗之譴……㊺

追逐聲色，成爲風氣。馮延魯等人甚至因爲想要廣置妓妾，而企圖篡改烈祖制定的「禁以良人爲賤」的法令。此議後來經過蕭儼的力爭才未行：

> 昇元之法，禁以良人爲賤，賣奴婢者，通官作券。至是，馮延魯等欲廣置妓妾，因矯遺制，許民私賣己子。儼駁曰：「此非大行之命，延魯矯爲之爾。昔延魯爲東都判官，上疏：『貧民不自給者，聽鬻己子。』大行問臣，臣曰：『往者陛下出府金以贖民子，故得天下歸心，大寶自至。今乃許民賣子以資豪民，非防微之道也。』由是延魯之請不行，今復行之，故知其矯先旨也。」議者以遺詔已出不可改，遂行。㊻

享受這種生活方式，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風流才子韓熙載：

> 韓熙載更畜女樂四十餘人，不加檢束，恣其出入，與賓客聚雜。後主累欲相之，而惡其如此，乃授右庶子分司於外。入朝辭，復上表乞住闕下……表上未報。於是，出群婢，使之即散。後主乃喜，遂以爲秘書監。群婢俄集如初……㊼

許多與韓熙載同樣癖好的人也以此互相唱和作樂，包括了韓的好朋友陳致堯，和忘年交舒雅：

> 陳致堯雍，熟於開元禮，官太常博士，國之大禮皆折衷焉。與韓熙載最善。家無擔石之儲，然妾妓至數百。暇奏霓裳羽衣之聲，頗以帷薄取譏於時……㊽

> 舒雅……熙載一見如疇昔……待之爲忘年之交，出入臥內曾無間然。

㊳ 見司馬光，《資治通鑑》，冊15，卷283，頁9246。
㊴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78，頁9089～90。
㊵ 參見韓熙載本傳。馬令，《南唐書》，卷13，頁56～57；陸游，《南唐書》，卷9，頁55。
㊶ 周宗爲烈祖謀臣、中主宰相、後主的大小周后之父。本傳見馬令，《南唐書》，卷11，頁49。
㊷ 見無名氏，《釣磯立談》，頁49；陸游，《南唐書》，卷1，頁8。
㊸ 鄭文寶，《江表志》，卷2，頁135；馬令，《南唐書》，卷4，頁21。
㊹ 馬令，《南唐書》，卷16，頁68，孫晟傳；又參見陸游，《南唐書》，列傳8，頁49。
㊺ 見馬令，《南唐書》，卷22，頁87，劉承勳傳；又參見陸游，《南唐書》，列傳卷12，頁70。
㊻ 馬令，《南唐書》，卷22，頁87；又參見陸游，《南唐書》，列傳卷12，頁69。
㊼ 馬令，《南唐書》，卷13，頁57；又參見陸游，《南唐書》，列傳卷9。頁56。
㊽ 無名氏，《江南餘載》，四庫全書，冊464，頁15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熙載性嬾，不拘禮法，常與雅易服燕戲，猱雜侍婢入末念酸，以爲笑樂……㊾

而當時在家中舉行女伎宴樂之事，似爲社會普遍的風氣，爲平常之舉，不足爲怪：

柴再用按家樂於後園，有從人竊窺於門隙者，再用遇之，召至園中使觀焉。曰：「恐隙風傷爾眸子。」㊿

在這種情況下，主人甚至還可能把歌姬當作下注的賭博物品，依輸贏而任意買賣：

高鎬有通天犀帶。業毅有歌人。皆當時無比者。嘗請博戲之。滿坐屏氣。鎬擲大勝。鎬命歌人引滿一曲以辭舊主。歌罷，遂攜以歸。(51)

歌伎也被當作禮物，作爲酬答贈送的禮品：

〔韓熙載〕才高氣逸，無所卑屈……初嚴績請熙載撰其父可求神道碑，欲苟稱譽，遺珍貨巨萬，仍輟未勝衣歌妓姿色纖妙者歸焉。熙載受之。文既成，但叙其譜裔品秩而已。績慊之，封還熙載。熙載亦卻其贈……(52)

以上這些例證，足以反映出中主時代南唐文臣生活糜爛的一斑。這與烈祖時期克勤克儉的風尚形成鮮明的對比。

B.　武將好大喜功

烈祖臨終勸誡中主：

㊾　馬令，《南唐書》，卷22，頁88，舒雅傳；陸游，《南唐書》未列舒雅傳。
㊿　無名氏，《江南餘載》，頁155。
(51)　同上註。
(52)　見韓熙載傳，馬令，《南唐書》，卷13，頁57。

德昌宮凡積兵器緡帛七百餘萬。吾既棄代，汝善和鄰好，以安宗祏爲意，不宜襲隋煬之迹，恃食阻兵，以自取亡覆也！(53)

中主最初也謹守遺命，從他的年號「保大」（一作「保太」）可見他想長治久安、保全致大的用意。(54)《釣磯立談》中特別指出這點：

元宗之初，尚守先訓，改元保大，蓋有止戈之旨，三、四年間皆以爲守文之良主。(55)

但是環繞在他四周的卻有許多「銳於趨進，常欲用事於四方，以要功名」的大臣如馮延魯、陳覺、及查文徽等人。(56) 這些人「多自謂國勢崇盛如舉太山以壓朽壤，盪定之期指日可俟。」(57) 再加上馮延巳的慫恿，使中主頓然改變守成保泰的初衷，而萌生經營天下的雄心。這種驟然的改變，顯現中主缺乏主見、昧於掌握客觀形勢、又冒然行事的個性弱點。

保大二年（944），中主派遣馮延魯、陳覺、和查文徽率軍攻打內亂的閩國。從此開始了一連串結怨四鄰的戰爭。伐閩之役共歷七年（944～950）。(58) 剛開始時（保大三年，945）南唐得勝，破建州、汀州、和泉州；在建州設永安軍。馮延巳也趁機諂媚，使中主更昏昏然，陶醉於勝利之中：

保大中查文徽、馮延魯、陳覺等爭爲討閩之役。馮延巳因侍宴爲嫚言曰：「先帝齪齪無大略，每日戢兵自喜，邊鄙偶殺一二百人，則必齎咨動色，竟日不怡，此殆田舍翁所爲，不足以集大事也。今陛下暴師數萬，流血於野，而俳優燕樂不輟於前，真天下英雄主也。」元宗頗

(53)　無名氏，《釣磯立談》，頁49；又參見陸游，《南唐書》，卷1，頁8。
(54)　唐圭璋以爲「保大」應作「保太」才是。見註③。
(55)　無名氏，《釣磯立談》，頁49。
(56)　見馬令，《南唐書》，卷21，頁82～86，黨與傳。
(57)　無名氏，《釣磯立談》，頁54。
(58)　伐閩之戰經過參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84，頁9278～9286，9292，9294；卷285，頁9296～9297；卷290，頁9458～72，9419～9420。

臺灣大學藝術 期刊資料庫

領其語。[59]

但是，保大五年（947），情勢逆轉，吳越助閩，聯兵反擊。馮延魯、陳覺、和查文徽三人又急於建功，不請詔命，迎擊失利。唐兵大敗，只好暫時自泉州撤軍。[60] 但由於連年征戰，國庫也因而耗竭。這場兵敗的結果，又引發了一場小小的黨爭：韓熙載和徐鉉分別上疏請殺馮延魯和陳覺，但中主不聽。韓熙載反而被宋齊丘反告一狀而被貶和州，已如前述。[61] 類似的事又見於保大十一年（953），徐鉉和徐鍇兩兄弟也因得罪馮延巳和馮延魯兩人而被貶。[62]

伐閩之役的始末、它所牽連的問題、以及所引發的惡果，正是中主一朝弊政的縮影：它關係到中主的易於聽信佞妄、賞罰不公、文人黨爭、武人好大喜功、以及因爲戰爭而結怨四鄰、耗損國力的事實。這些也正是促使南唐國勢一蹶不振的基本原因。然而，中主君臣對於這些弊端卻視而不見，而且重複施行，有如吸毒，越涉越深，愈演愈烈。伐閩之後，又西向伐楚，先得後失；南向伐南漢，失利；與北方的後漢衝突；後來招致後周的大舉進攻，最後逼得中主割土求和，去國號奉周正朔的慘劇。歷觀中主一朝，可以說是征戰連年。作者根據《資治通鑑》所載，集成中主時期戰役簡表如下：

中主時期戰役簡表

（據《資治通鑑》卷284，頁9278～卷294，頁9602）

943	保大元年	中主即位
944～950	保大二～九年	伐閩戰役歷時八年，先勝後敗。曾克建州、汀州、泉州。置永安軍於建州，最後撤軍，國力大損（卷284，頁9278～94；卷288，頁9417；卷289，頁9419～20；卷290，頁9458～72）
949	保大七年	伐河中，與後漢衝突。唐有海州，漢有沂

[59] 無名氏，《釣磯立談》，頁53。
[60]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86，頁9349～9350。
[61] 參見註[36]。
[62] 參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53，頁9498。

		州。（卷288，頁9403～9412）
950	保大九年	①唐兵敗於閩，自閩撤軍。（卷289，頁9418）
		②後漢攻唐，唐佈兵江北。（卷289，頁9419）
951	保大九年	滅楚，佔土，取珍寶金帛歸金陵。（卷290，頁9465～9472）
952	保大十年	①有定天下爲一家之心。（卷290，頁9467）
		②四月，伐南漢之桂州、全州，失敗。（卷290，頁9476～77）
		③十月，盡失楚舊地。唐以比年出師無功，議休兵息民。（卷291，頁9486）
955	保大十三年	唐主有併天下之志。（卷292，頁9532）
		馮延巳建議與後周交戰。（卷294，頁9584）
		十一月，後周李穀敗唐兵千餘人於山口鎮。（卷292，頁9533）
956	保大十四年	①正月，後周世宗親征淮南，並邀吳越伺機夾擊南唐。（卷292，頁9534）
		②後周世宗續攻南唐江北之地，唐兵敗。（卷292，頁9536～37）
		③二月，南唐中主派鍾謨、李德明奉表納貢、稱臣，世宗斥之。（卷292，頁9539～40）
		④三月，中主又派孫晟、王崇質奉表納貢入見，求世宗退兵，不許。（卷293，頁9546）
		⑤中主再遣李德明、孫晟奉表請去帝號、並割江北六州，世宗不許。（卷293，頁9548）
		⑥趙匡胤伐揚州，唐兵潰敗，精萃盡。（卷293，頁9553）
		⑦六月，南唐兵與後周在江北拉鋸戰。（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93，頁9558）

957	保大十五年	後周世宗以水軍大敗唐兵。唐之戰艦在淮上皆盡。（卷293，頁9564，9575）
958	後周顯德五年 唐中興、交泰元年	後周戰艦由淮入江。南唐中主遣馮延巳犒軍，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割江北未陷各州予後周。（卷294，頁9583）
959	後周顯德六年	七月，中主欲遷都豫章（南昌）。（卷294，頁9602）
960	北宋建隆元年	宋太祖代周自立。
961	北宋建隆二年	二月，南唐中主遷都洪州（南昌），六月卒。

縱觀中主在朝的十九年（943～961）期間，共有十四年是處在戰爭之中。休戰時間很短，只有五年：保大元年（943），他剛即位；保大十一～十二年（953～54），他以長年出師無功而下詔弭兵；及建隆元年～二年（960～61），他在抗周失利，割地稱臣之後，又怕北宋軍隊來犯，因而遷都，終於悒鬱而卒。南唐在這連年征戰之中，結果是無一勝利；不但割地稱臣，喪失國土一半，而且又因大軍的軍費，以及數度以大量金銀財物入貢後周，而使國庫耗竭一空，銅錢大量流失。[63] 周顯德六年（958），鍾謨請鑄「永通泉貨」大錢，以一當十。國家財政陷入危機：

> …及元宗即位，兵屢起，德昌泉布既竭，遂鑄唐國錢，其文曰「唐國通寶」，又鑄「大唐通寶」，與唐國錢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爲輕小。保大末，兵窘財乏。鍾謨改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64]

中主即位之初與逝世之時的南唐財政情況，實爲天壤之別。烈祖累積下來的大筆財富，到此時已消耗殆盡。南唐已成赤貧。這種窘境明顯地反映在烈祖的永陵和中主的順陵這二座陵墓的排場和殉祭器上。二者形成强烈的對

[63] 有關南唐納貢事，參見無名氏，《南唐史》，收入清代稿本百種彙刊（台北：文海書局，無出版年月），〈兩朝事大〉條，頁111～135。

[64] 馬令，《南唐書》，卷5，頁23。又參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94，頁9603，9605。

比。最具體的莫過於：烈祖永陵中的哀冊爲玉製；但是，中主順陵中的哀冊卻連玉材都供不起，只能刻在石版上了。[65]

南唐在國防和財政兩方面遭受到如此嚴重的挫敗，引發了嚴重的存亡危機。其所以致此，並非中主昏庸、無所作爲所致。相反的是，中主對客觀情勢缺乏認識，對臣下策略的合適性缺乏判斷能力，易於爲佞言所惑，在急於進取之下，採取了錯誤的發展政策，完全違背了烈祖的遺命。這便是中主治績的第三個弊端，如下所述。

3. 軍事外交政策錯誤

爲明白中主軍事和外交政策如何異於烈祖的策略，在此，我們必先了解烈祖的建國策略。烈祖長於謀略，已於拙文中論述過。[66] 烈祖立國後，偃兵息武，對於建設南唐，有爲有守，目標明確：富國强兵，結好四鄰，無拓土野心，以用兵爲不得已之事。他常說：「百姓皆父母所生，安用爭城廣地，使肝腦異處，膏塗草野？」[67] 從以下他所作過的幾件事中，可以明顯的看出他富國强兵，保盈持泰的政策。

首先是他的保護農業措施：昇元三年（939）正月，烈祖頒佈〈恤農詔〉，撫恤貧苦，計口給食，並授土給農民：

> 比者干戈相接，人無定主。地易而弗藝，桑隕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憫之。其嚮風面內者，有司計口給食。願耕植者，授之土田，仍復三歲租役……[68]

昇元四年（940）二月，烈祖又下詔，「罷營造力役，毋妨農時」。[69]

其次，烈祖努力與吳越保持和平：早在烈祖還侍吳國爲左僕射時（918），吳國與吳越兩國激戰，吳越敗。此後終烈祖之世，二國未再交

[65] 參見曾昭燏等編，《南唐二陵發掘報告》，頁82～90。

[66] 陳葆真，〈南唐烈祖的個性與文藝活動〉，頁27～46。

[67] 無名氏，《釣磯立談》，頁48。

[68] 見《欽定全唐文》，（台北：鼎文書局影印1814年版），冊3，卷128，頁1612；又參見馬令，《南唐書》，卷1，頁5；陸游，《南唐書》，卷1，頁6。

[69] 陸游，《南唐書》，卷1，頁7。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兵。[70] 昇元五年（941），吳越大火又水災，宰相宋齊丘力勸烈祖趁機入侵，烈祖不爲所動，反而以大量物資救濟吳越。[71] 另外，烈祖也與西鄰的楚，和嶺南的南漢維持和平的關係。昇元五年（941），南漢主邀烈祖共謀出兵取楚分地。烈祖謝絕。[72]

還有便是結盟契丹。烈祖在建國前數月（937），採用了宋齊丘的計策，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通契丹。契丹也遣使回報。兩國修好。[73] 結盟契丹的目的或在於有朝一日，以遠交近攻的方法，進兵中原。爲防止契丹與中國合作對南唐北進造成巨大阻力，烈祖採用宋齊丘的反間計，破壞二者的友好關係：「契丹遣使詣唐，宋齊丘勸唐主厚賄之，俟至淮北，潛遣人殺之，欲以間晉。」[74]

上述烈祖的策略曾遭到宋齊丘和馮延巳等人的質疑。《釣磯立談》上有一段他們之間極爲精彩的辯論：

> 唐祚中興，大臣議廣土宇，往往以爲當自潭、越始。烈祖不以爲是。一旦，召宋齊丘、馮延巳等數人俱入。元宋侍側。上曰：「天下之勢，低昂如權衡。要當以河山爲腹背。腹背奠，然後手足有所運。朕藉楊、徐遺業，撫有東夏，地勢未便。猶如繪事，窘於邊幅。雖有手筆，無所縱放。毛遂云：『錐未得處囊中故也。如得處囊中，則必脫穎而出矣。』我之所志，大有以似此……。」馮延巳越次而對曰：「河山居中，以制四極，誠如聖旨。然臣愚，以爲羽毛不備，不可以遠舉。旌麾黯闇，不可以號召。輿賦不充，不可以興事。陛下撫封境之內，恭已靜然，所以自守者足矣。如將有所志，必從跬步始。今王潮餘孽，負固閩徼。井蛙跳梁，人不堪命。錢唐君臣孱鶩不能自立，而又刮地重斂，下户斃踣。荊楚之君，國小而夸以法。論之皆將肇亂。且其壤接地連，風馬相及。臣愚，以爲興王之功，當先事於三國。」上曰：「不然……錢唐父子，動以奉事中國爲辭。卒然犯之，其名不祥。閩土險瘠，若連之以兵，必半歲乃能下。恐所得不能當所失也。況其俗怙彊喜亂，既平之後，彌煩經防。唯諸馬在湖湘間，恣爲不法。兵若南指，易如拾芥。孟軻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寸地，而享天下之惡名，我不願也。孰若悉輿稅之入，君臣共爲節儉。惟是不腆之圭幣，以奉四鄰之歡。結之以盟詛，要之以神明。四封之外，俾人自爲守。是我之存三國，乃外以爲蔽障者也。」[75]

烈祖清楚的認識到，真正的威脅是勢力强大的北方中原。因此，他必須保持實力，維持南方的和平，與四鄰結好，作爲南唐的外圍屏障。他的最終目的，是在生聚教訓，富國强兵之後，再伺機北上，稱霸中原。因此，他接著又說：

> 疆場之虞不警於外廷，則寬刑平政，得以施之於統內。男不失秉耒，女無廢機織。如此數年，國必殷足。兵旅訓練，積日而不試，則其氣必倍。有如天啟其意。而中原忽有變故，朕將投袂而起，爲天下倡。倘得遂，北平僭竊，寧又舊都，然後拱揖以招諸國。意雖折簡可致也。亦何以兵爲哉？」於是孫晟及宋齊丘同辭以對曰：「聖志遠大，誠非愚臣等所及也！」[76]

這又可見到烈祖深謀遠慮，修兵偃武，以備有朝一日，遠交近攻，進兵中原的計劃。但是，這個嚴密、務實、而有步驟的軍事和外交策略，卻被沒有主見的中主和浮誇好功的馮延巳等人，輕舉妄動的整個破壞了。中主即位後，馮延巳乘倖進言，譏笑烈祖的策略爲「田舍翁」之舉，已如前述。他建議中主伐閩、攻楚，推行當年他向烈主獻策而不爲採用的那套計劃。後來又侵南漢、與後漢交兵、甚至出兵與後周大戰，這些與烈祖背道而馳的行動，都是馮延巳出的主意。[77]

保大二年，中主聽馮延巳等人之議，開始伐閩戰爭之後，用兵八年，兵疲國窮。保大五年（947），中原發生變局，契丹滅後晉。依烈祖當初的計劃，這也正是北伐的時機。韓熙載建議中主：南唐可乘虛北上。但是，由於

[70] 無名氏，《釣磯立談》，頁48；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70，頁8846～49。
[71] 參見無名氏，《釣磯立談》，頁49；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82，頁9226；陸游，《南唐書》，卷1，頁7。
[72] 事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82，頁9221～22。
[73]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81，頁9173；又參見陸游，《南唐書》，列傳卷15、契丹傳，頁83～84。
[74]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81，頁9189；陸游，《南唐書》，列傳卷15，頁84。
[75] 無名氏，《釣磯立談》，頁51～52。
[76] 無名氏，《釣磯立談》，頁52～53。
[77]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94，頁9584。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那時南唐正用兵福建，無力他顧，因而坐失良機。中主爲此十分懊悔。[78] 後來由於閩役久戰無功，保大八年（950），中主只好撤軍，並下〈恤民詔〉：

> ……曩者兵連閩越。武夫悍將，不喻朕意，務爲窮黷。以至父征子鉤，上違天意，下奪農時。咎將誰執？在予一人。大赦境內，窮民無告者，咸賜粟帛。[79]

中主此時似有悔意。但是，不久又攻楚得地，並將大量財物輸送回金陵（參見前面簡表）。中主被勝利冲昏了頭，雄心再起，與後漢在淮北交兵數次，並想進兵中原。但是，這時中原情勢已經安定，南唐北上也非時機了。韓熙載明白大勢已去，因此改變他稍前的主張，明言反對：

> 唐之言事者猶獻取中原之策。中書舍人韓熙載曰：「郭氏有國雖淺，爲治已固。我兵輕動，必有害無益。」[80]

但是，中主經不起馮延巳的慫恿，不久又輕易地與後周對峙。最後終於招來了喪土辱國的慘局。而在與後周的戰役中，同時引起了吳越夾擊的危機。南唐已然陷入背腹受敵的困境。

至於與契丹的外交，雖然保持友好，甚至還可能結過姻親；[81] 但是兩國的關係卻被後周的反間計所破壞。保大十二年（955）契丹派使者到南唐，回程路上，被後周派刺客謀殺，嫁禍南唐。從此，契丹與南唐外交完全斷絕。[82] 因此，當保大十四～十五年（957～958）南唐與後周交兵正激烈時，雖然中主兩度派人渡海求契丹支援，但是契丹都未相助。[83]

可以說中主違背了烈祖的政策，一意孤行的結果，造成了南唐的貧、弱、與孤立。然而陸游對此卻有不同的看法，他以爲南唐失敗的原因不在於

[78] 參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86，頁9338。
[79] 《全唐文》，卷128，頁1613；馬令，《南唐書》，卷3，頁15。
[80]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90，頁9475。
[81] 傳中主有女名芳儀曾嫁契丹王爲妻，宋人晁補之爲此作〈芳儀怨〉。詳見夏承燾，《南唐二主年譜》，頁13，89，90。
[82] 見陸游，《南唐書》，列傳卷15，頁84；又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94，頁9606。
[83] 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92，頁9541；卷293，頁9562。

中主施政錯誤這一點上，他甚至肯定中主伐閩征楚的政策：因爲南唐如能因此而統一南方，便可與中原分庭抗禮，平分秋色，不致於滅亡，可惜的是中主用人不當：

> …唐有江淮，比同時割據諸國，地大力强，人材衆多。且據長江之險，隱然大邦也。若用得其人，乘閩、楚昏亂，一舉而平之。然後東取吳越，南下五嶺，成南北之勢，中原雖欲睥睨，豈易動哉？不幸諸將失律，貪功輕舉，大事弗成，國勢遂弱。非始謀之失，所以行之者非也……[84]

雖然中主在重挫悔恨之餘，殺了權相宋齊丘、佞臣陳覺、與周謀和的鍾謨、以及怒責勸他遷都的唐鎬，但是大勢已去，悔之晚矣！[85] 他從烈祖手中接受的是一個殷實富强的國家；但是，他留給後主的，卻是一片殘破、貧弱、而危機四伏的河山。中主實在是一個十分失敗的政治家！

二、中主的文化建設

姑不論中主是一個如何失敗的政治家，他卻是個具有深厚人文素養的翩翩君子。這當然與他父親嚴謹的家庭教育與文藝氣息有關。中主能騎射，好讀書，自幼習受儒家經典，兼好佛、道，文武兼備，儀表出衆。他的儒雅風度聞於四鄰，已如前述，本身更具有很高的文藝才華：能詩詞、解音律、擅書法，且收藏大批品質精良的書籍、書法、和繪畫。他曾命臣下刊刻法帖，以廣流傳，也曾開設書院，推廣教育，並曾施行貢舉，選拔人才。以下，作者將就史籍所見，一一舉証，以明中主的人文素養，以及在他治下，南唐文化建設的梗概。

1. 儒者風範

中主文武兼備的事實，與他同時及稍後的史家已有明白記載。其中最重要的是入仕北宋的南唐舊臣徐鉉，在《江南錄》中的一段話：

[84] 陸游，《南唐書》，卷2，頁15。
[85] 分別參見馬令，《南唐書》，卷4，頁20～21；陸游，《南唐書》，卷2，頁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嗣主（元宗）工筆札，善騎射、賓禮大臣，敦睦九族……少有至性，仍懷高世之量。始出閤，即命於廬山瀑布前構書齋，爲他日終焉之計。迫於紹襲，遂捨爲開先精舍……[86]

從上文可見中主的人格修養中，兼具儒、釋、道三家思想的影響；比如他「賓禮大臣」、「敦睦九族」、及「節儉得中」，等都反映儒者的行爲。而他很早便在廬山築讀書台，預爲將來退隱之所，則可見他生性淡泊，近於道家。後來捨台爲寺，更見他對佛教的尊崇。[87]

中主的儒者行爲，又見於他對兄弟的友愛和對大臣的禮遇。這些行爲風範，也對當時的社會風氣造成正面的影響。中主對兄弟友愛有加，不論在政權或生活方面，他都與諸弟分享。他不但和他們共治國家，甚至還想傳位給他們，這些事實已如前述。在生活上，中主更不忘隨時與諸弟共享歡樂：

（中主）友愛之分，備極天倫。登位之初，太弟遂、燕王遏、齊王達，出處游宴，未嘗相捨，軍國之政，同爲參決。[88]

在這種誠意相待之下，中主與諸王之間，情份深厚，相處和睦。景遂雖曾執政，大權在握，景達也曾因才高出衆，而差點被烈祖立爲皇太子，但是二人卻絲毫未生私心，一意支持中主。這種友愛氣氛後來也影響到中主諸子之間的誠摯相待（這在後主部份將再提到）。這實是烈祖家庭教育的成功。南唐三朝，諸皇子之間，全無奪嫡之事，可見其皇家教育講究倫理規範的道德標準之崇高。[89]

又，中主謙和下士，禮遇大臣，處處留心的客氣作風，幾乎到忘去尊卑的程度，就連他自己有時衣冠隨意，也要跟大臣表示歉意：

[86] 徐鉉小於中主十四歲，曾仕南唐，爲中主及後主重臣。後歸附北宋，奉太宗之命與湯悅合著《江南錄》十卷。此書到清代乾隆時已失傳。其中許多資料幸賴宋代史家，如司馬光、馬令、和陸游等人引用而保存一部份。此處引文，見於馬令，《南唐書》，卷4，頁21；又參見陸游，《南唐書》，卷2，頁14～15。

[87] 開先寺在廬山南麓鵂鶹山峰下。讀書台在開先等中，久已荒廢，民國二十一年（1935）上海水災義賑會修復之。見吳宗慈於1936年編的《廬山志》，收於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台北：明文書局重印，1980），第2輯，冊2，卷5，頁643～645。

[88] 鄭文寶，《江表志》，卷2，頁137。

[89] 唯一的例外是中主的長子弘冀，他因嫉妒皇叔景遂可能因掌大權而奪他繼承皇位的機會，因而設計予以酖殺，見註[24]。

元宗接群臣如布衣交。閒鄉小殿，以燕服見學士，必造中使謝曰：「小疾不能著幘，欲冠帽，可乎？」[90]

雖然從表面上看起來，中主似乎太拘小節，但是這種行爲更顯出他以誠待人，待大臣如對賓客的平等心。這種禮遇或許正是南唐雖然享國短促，爭戰不息，而朝中少有奸臣和叛將的原因。[91] 查南唐只有黨與爭利，如前述的權臣宋齊丘、馮延巳和所謂的「五鬼」，而無奸臣。至於叛將也只有後來的劉澄、朱元、和劉從效等人而已。[92]

2. 崇佛好道

中主是個篤誠的佛教徒。他早年捨讀書台爲開先寺，已如上述，即位後又大起佛寺及僧房。自己更如虔誠的佛教徒一般聽經及作疏：他曾命僧人玄寂入宮講《華嚴經》；又因本身喜歡《楞嚴經》，而命擅於書法的僧人應之抄錄經文，再命馮延巳作序。[93] 對於廬山原來的佛寺高僧，中主特別禮敬。他曾敦請行因禪師赴金陵，但被婉拒。後來在遷都往南昌時又特別去開先寺聽紹宗禪師說法。這兩位禪師極爲博學，並爲禪宗六祖惠能的嫡傳弟子青原行思的第七世法嗣。[94] 此外，中主還在金陵廣開道場，比較著名的有大報恩寺、大報慈寺、和清涼寺等道場。其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清涼寺。清涼寺位在金陵的石頭山，本爲烈祖義父徐溫掌吳國大權時創建的，原名興教寺。中主保大二年（944）改爲石頭清涼大道場。清涼寺是南唐皇室最重要的宗教活動場所。寺中曾建有李氏避暑宮，及德慶堂，堂匾爲後主所書，又有名畫家董羽畫龍，及李霄遠草書，合稱三絕。且有後主爲追薦烈祖而造的鐘。[95] 中主常赴清涼道場聆聽法會並禮敬住持休復悟空（～943）和文益

[90] 陸游，《南唐書》，卷2，頁53。

[91] 陸游也有這種看法，見上註。

[92] 有關三人傳記，參見馬令，《南唐書》，卷27，頁104～106。

[93] 馬令，《南唐書》，卷26，〈浮屠傳〉，頁102。

[94] 參見吳宗慈，《廬山志》，冊3，卷9，頁852～853。

[95] 關於清涼寺，見葛寅亮於天啟七年（1627）編的《金陵梵剎志》，收入杜潔祥主編的《中國佛寺史志》（前引書），第1輯、冊4，卷19，頁847～849。中主建大報恩及大報慈道場事，見同書，卷48，頁1440～1443。中主於保大二年（甲辰，944）創清涼大道場事，見〈休復禪師傳〉，收於楊億編《景德傳燈錄》（1004序），四部叢刊（台北：商務印書館），冊32，卷24，頁233。

臺灣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期刊資料庫

法眼（885～958）兩位禪師。這兩位高僧並爲青原行思的第八代法嗣。[96] 悟空禪師卒後八年（保大九年，951），中主還曾爲文祭禱，可知他的真心誠意，日久不遷。[97] 文益禪師擅於詩文，常與中主論道，並曾以〈牡丹詩〉諷喻中主以萬法皆空的道理。[98] 保大十三年（955），中主又曾作禪宗四祖道信大師塔院疏。[99] 此外，中主也曾一度親近金陵証聖寺的木平和尚，報恩院的清護禪師和匡逸禪師，以及報慈道場的玄覺導師。[100] 這些行爲顯示中主信佛之誠心與篤行。又由他之喜好《楞嚴經》，以及和禪宗大師的往來，足証中主與禪宗信仰的關係密切，特別是青原行思的嫡傳系統。

中主信佛是深受烈祖影響的結果；而烈祖信佛則是因爲家中長輩信佛的緣故。據陸游所記，烈祖的父親李榮「性謹厚，喜從浮屠游，多晦跡精舍。」[101] 又據鄭文寶所說，烈祖「有姨出家爲尼。」[102] 由於家庭環境的影響，烈祖篤祖佛教，因此，他有國之後，廣建佛寺僧舍，常設無遮大會，廣行佈施。[103] 昇元年間烈祖在金陵新建的佛寺有淨妙寺，此外，又改興教寺爲清涼寺，瓦官寺爲昇元寺。[104] 在如此崇佛的氣氛下，中主信佛已經因緣具足了。因此即位後才會大開道場，禮敬禪師。南唐皇室成員除了景遇之

[96] 見楊億，《景德傳燈錄》，卷24，頁230～233。

[97] 祭文在清涼廣慧寺；「保大九年，歲次辛亥，九月，皇帝以香茶乳藥之奠，致祭於右街清涼寺悟空禪師。」見陸游，《入蜀記》，四庫全書，冊460，卷1，頁885。寺中另外有〈悟空禪師碑〉，文爲同年韓熙載所撰，並以分書篆額，見陳思，《寶刻叢編》，四庫全書，冊682，卷15，頁450。

[98] 詩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見葛寅亮，《金陵梵剎志》，頁852～853，轉引自《五燈會元》。夏承燾，《南唐二主年譜》，頁68轉引宋人《冷齋夜話》中誤認此詩爲文益爲後主作、實非，因文益卒於後周顯德五年（958），當時後主尚未登基。又、文益擅長詩文，留有法語，見《景德傳燈錄》，卷28，頁293～294；又文益頌十四首，見同書，卷29，頁301～302。

[99] 道信曾住湖北蘄州破頭山，卒於唐高宗永徽二年（651）。次年其塔忽開，門人不敢復閉，見《景德傳燈錄》，卷3，頁26。中主或於此時再修其塔院並作疏，見闕名，《寶刻類編》，四庫全書，冊682，卷1，頁591。又見夏承燾，《南唐二主年譜》，頁30。

[100] 見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冊5，卷48，頁1438～1443。

[101] 陸游，《南唐書》，卷1，頁4。

[102] 鄭文寶，《江表志》，卷1，頁132。

[103] 見馬令，《南唐書》，卷26，〈浮屠傳〉，頁101；陸游，《南唐書》，卷15，〈浮屠傳〉，頁82。

[104] 分別見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冊5，卷48，頁1421；冊4，卷19，頁847；冊4，卷21，頁893。

外，無一不篤信佛教。[105] 保大中，烈祖的四子景達更爲超渡烈祖而建了奉先寺。[106] 至於後主信佛之篤誠就更不在中主之下了。（這將在後主一文中專論。）

總之，中主信佛的影響所及，既廣且深。文臣武將崇佛茹素，蔚爲風氣。比較有名的如孫晟、李建勳、宋齊丘、陳覺、韓熙載等人，都曾有詩文碑記等留於佛寺。[107] 就連不太信佛的徐鉉，也不能免俗地在保大九年（辛亥，951）作了一篇〈攝山棲霞寺新路記〉。[108] 最有趣的是武將邊鎬。邊鎬曾帶兵伐閩攻楚，是中主朝重要的戰將。但是，他「爲人柔懦，酷懼釋氏」，因此言行無威而軍紀不嚴，戰果也因時而異，民間便戲稱他爲「邊菩薩」和「邊和尚」。[109] 朝臣信佛的結果，多流行素食，實行的方式是「月爲十齋。至明日，大官具晚膳，始復常珍，謂之『半堂食』。」[110]

此外，中主對道教也頗有興趣。這當然也受到烈祖的影響。烈祖自己服食金丹，因此個性暴燥，後來竟因此而亡。[111] 雖然他臨終之時頗有悔意，但風氣已開，效行者不乏其人，朝臣中就有孫晟，徐玠，陳陶，潘佑，和李平等人。[112] 烈祖的四子景達也好神仙之術。[113] 當時有名的術士包括廬山的楊保宗，[114] 太醫吳廷紹、李冠、譚紫霄、潘扆、和耿先生等人。[115] 中主雖然未服金丹，但是，他和女術士耿先生之間的關係卻充滿了曖昧神奇：

女冠耿先生，鳥爪玉貌，宛然神仙。保大中遊金陵，以道術修鍊爲

[105] 見馬令，《南唐書》，卷7，頁34，景遇傳。

[106] 見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冊5，卷48，頁1393。

[107] 其他另有江彬、伍喬、陳貺、鄭元素、李中、江爲及史虛白等人。這些人的墨蹟曾刻石，存於廬山諸佛寺中，參見吳宗慈，《廬山志》，冊18，卷9，頁848～851；冊19，卷10，頁1277～1284；冊20，卷11，頁1867，1870，2017。

[108] 徐鉉文見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冊4，卷4，頁507～508；另外，李建勳及宋齊丘等人遊金陵佛寺詩文，又見同書，卷4，頁618～619；卷21，頁959～960，982。

[109] 馬令，《南唐書》，卷11，頁51，龍袞，《江南野史》，卷2，頁77。

[110] 見夏承燾，《南唐二主年譜》，頁2及58，轉引《青箱雜記》及《續通鑑》。

[111] 陳彭年，《江南別錄》，頁124；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83，頁9245。

[112] 分見各人傳記；徐玠傳載於馬令，《南唐書》，卷10，頁47；陳陶傳見卷15，頁64；孫晟傳，見卷16，頁68；潘佑及李平傳，見卷19，頁79。

[113] 馬令，《南唐書》，卷7，頁34。

[114] 見吳宗慈，《廬山志》，冊3，卷9，頁858

[115] 馬令，《南唐書》，卷24，〈方術傳〉，頁96～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事。元宗召見，悅之，常止於臥內……嘗搦雪爲鋌，爇之成金，指痕隱然猶在……未幾有孕將誕。謂左右曰：「我子非常產，夕當有異」，倏忽雷電繞室，大雨傾樹。詰旦，儼然空腹。人莫見其所生。元宗姐，先生不復入宮，往來江淮，竟不知其所之。[116]

後代畫家並曾根據這個神秘的傳說，作過《耿先生煉雪圖》。[117] 另外，元宗諸弟中，景達也曾好神仙脩鍊之事，後來因受他的記室徐鍇作了一篇〈述仙賦〉諷喻他才停止。又傳元宗十子中有一人爲道士名良佐，在福建武夷山修道，後主曾勅有司爲他建會仙觀。[118] 雖然後主本人也曾經召見道士譚紫霄，但並未溺於丹藥。總之，南唐皇室後來對於道教的興趣遠不及對佛教來得濃厚。

3. 擅長詩詞

中主爲彬彬儒者，擅長詩詞，名聞當代，可惜作品多已流失。以下作者將他存世的作品分爲文章、詩、和詞等三類來討論。首先談他的文章。中主的文章傳世的有十二篇，收於清嘉慶十九年（1814）敕編的《欽定全唐文》中。[119] 就體例上來說，這十二篇文章都是官方文件，計有二「詔」，二「書」，及八「表」。雖然每件文章都未紀年，但是從文章中提到的事件內容去尋索正史，多半可以找到它們行文的時間。它們大約都作成於保大六年（948）到交泰元年（周顯德五年，958）的十年之間，依序爲：①〈上漢帝書〉成於保大六年（948）。[120] ②〈恤民詔〉成於保大八年（950）春正

[116] 馬令，《南唐書》，卷24，頁97。

[117] 參見臺靜農，〈書宋人畫《南唐耿先生煉雪圖》之所見〉，《中外文學》，1975年，3卷，8期，頁8-17。據臺先生所述，此圖今藏台北故宮博物院，但作者遍查《故宮書畫錄》而未得。然就風格而言，此畫似應爲明代以後畫家作品。

[118] 景達好仙事見馬令，《南唐書》，卷7，頁34；元宗十子爲道士事見吳任臣，《十國春秋》，卷19，頁12b。

[119] 見《欽定全唐文》，冊3，卷128，頁1613～1617。又據謝世涯在他的〈南唐李后主詞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1994），頁8中指出管效先的《南唐中主文集》中收了17篇。但因作者不曾見過管書，因此無法在此論辨，姑存此記。

[120] 文見《全唐文》，卷128，頁1617上；事見馬令，《南唐書》，卷3，頁15；又見陸游，《南唐書》，卷2，頁10

月。[121] ③〈賜周宗詔〉成於保大十三年（955）十月。[122] ④〈奉大周皇帝書〉成於保大十三年十一月。[123] 此時南唐抗周失利，企望謀和，外交文件仍採平等方式的「國書」。此後南唐則因戰況節節失利，在被迫之餘，割地，稱臣，買宴，犒軍，外交文件行文都採臣下呈君主的「表」。⑤〈上周世宗第一表〉成於保大十三年（955）十月。[124] ⑥〈上周世宗第二表〉成於保大十四年（956）正月。[125] ⑦〈謝遣王崇質等歸國表〉，⑧〈請令鍾謨歸國表〉都成於保大十四年春正月。[126] ⑨〈進買宴錢第一表〉，⑩〈進買宴錢第二表〉，⑪〈進奉錢絹茶米等表〉，及⑫〈請改書稱詔表〉等四件應都作成於交泰元年（顯德五年，958）左右。[127] 然而，以上的這些官式文書或許都出於專司文書的朝臣之手，因此不能代表中主的創作。

其次，我們來看中主的詩。中主的詩存世的只有兩首，以及殘句三對，全登錄在康熙敕編的《欽定全唐詩》中。[128] 其一爲七言古詩：

〈遊後湖賞蓮花〉

夢花蘸水火不滅，水鳥驚魚銀梭投；
滿目荷花千萬頃，紅碧相雜數清流；
孫武已斬吳宮女，琉璃池上佳人頭。[129]

[121] 同注[79]

[122] 文見《全唐文》，卷128，頁1613下；事見馬令，《南唐書》，卷3，頁17。

[123] 文見《全唐文》，卷128，頁1617上；事見馬令，《南唐書》，卷3，頁18；但陸游，《南唐書》，卷2，頁12，卻載爲保大十四年春正月之事，此爲夏承燾《南唐二主年譜》，頁30所採用。

[124] 文見《全唐文》，卷128，頁1613下～1614上；事見馬令，《南唐書》，卷3，頁18；陸游，《南唐書》，卷2，頁12，則以爲是保大十四年二月之事，夏承燾，前引書，頁31從之。

[125] 文見《全唐文》，卷128，頁1614～1615上；事見馬令，《南唐書》，卷4，頁19；陸游，《南唐書》，卷2，頁13，以此爲同年三月之事；夏承燾從之。

[126] 文見《全唐書》，卷128，頁1615上，及頁1616；事見馬令，《南唐書》，卷4，頁19。

[127] 文見《全唐文》，卷128，頁1615～1617；事見馬令，《南唐書》，卷4，頁20；陸游，《南唐書》，卷2，頁14；夏承燾，前引書，頁32～33。

[128] 見《欽定全唐詩》（1706），四庫全書，冊1423，卷8，頁157～158。

[129] 《全唐詩》，卷8，頁1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他以火紅的蓼花與穿梭的銀魚，以及紅碧相雜的荷花和荷葉，共同鋪造出一片色彩艷麗的夏天湖景。但是他在末句用典的殺氣太重；他引用了春秋時代被孫武在練兵時斬殺的吳國宮女艷麗的臉龐，來比喻荷花的嬌美，使人讀來有毛骨悚然之感，甚至有人引以爲是不祥之兆。[130]

其二爲七律體的〈賞雪詩〉，前有短序：「保大五年元日大雪，同太弟景遂，汪〔江〕王景遇，齊王景達〔逵〕，進士李建勳，中書徐鉉，勤政殿學士張義方登樓賦」：[131]

珠簾高捲莫輕遮，往往相逢隔歲華；
春氣昨宵飄律管，東風今日放梅花。
素姿好把芳姿掩，落勢還同舞勢斜；
坐有賓朋尊有酒，可憐清味屬儂家。

詩中的用字遣詞清雅，提到中主與兄弟君臣同登高樓，在音樂聲中，一面飲酒，一面欣賞雪中梅花的雅事。保大初年，南唐正值盛世，中主也心情怡暢，君臣同歡。至於他的七言殘句：「樓鳳枝梢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據說是他十歲時詠竹的句子，但也有人以爲這是烈主所作。[132] 他的兩對五言殘句：其一爲「蒼苔迷古道，紅葉辭朝霞」，據傳是刻於廬山百花亭。[133] 這兩句全然寫景：利用「蒼苔」和「紅葉」這兩種強烈的色彩對比，描繪艷麗又淒迷的秋景。詩中不見愁與恨，只見形象之美及對仗之工，可能是他早年用心詩詞的鍊句。他的最後一對五言殘句：「靈槎思浩盪，老鶴倚崆峒」，則流露出強烈的失落感。此句作於他去世那年（961），那時他已遷都到南昌，每望江北顧，便想起江北的失土，以及向後周稱臣納貢的無限曲辱，因而忽忽不樂，深有所感而有此作。[134]

再次，我們來看中主的詞。中主以詞聞名後世，但由於作品多已散失，

[130] 同上注；又見清李調元編，《全五代詩》（1780序）（台北：新文豐公司，1984重印），卷24，頁382。

[131] 此事及此詩首先登錄於鄭文寶的《江表志》，卷2，頁137～138之中；馬令和陸游兩人的《南唐書》都未載；但夏承燾在《南唐二主年譜》頁26中，卻說他依據陸游之書，又據其他各書，考訂此爲保大七年之事。

[132] 《全唐詩》，卷8，頁158上；又見李調元，《全五代詩》，卷24，頁381，前主李昇條。

[133] 《全唐詩》，卷8，頁158。

[134] 鄭文寶，《江表志》，卷2，頁137；《全唐詩》，卷8，頁158上。

因此沒有專集傳世，存世的只剩下四闋。[135] 據南宋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所載，得知中主的詞最早在南宋高宗紹興末年（約1159～1162間）已與後主詞合刊爲《南唐二主詞》。歷代學者對他們父子的詞素有偏愛，多有翻刻。[136] 近代學者少有專論中主的詞，而多半將他與後主詞一同研究，據作者所知，比較重要的有以下的六種專書，依時間順序爲：

1. 王國維校補，《南唐二主詞》（收入《展風閣叢書》，冊16，及《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1928）。
2. 唐圭璋，《南唐二主詞彙箋》（1937初版，台北：正中，1966三版）
3. 王仲聞，《南唐二主詞校訂》（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4. 詹安泰，《李璟・李煜詞》（北京：人民文學，1958）
5. 王次聰，《南唐二主詞校注》（台北：世界，1965）
6. 謝世涯，〈南唐李后主詞研究〉（上海：學林，1994）

其中又以唐圭璋的彙箋本最爲詳盡。以下作者試讀中主詞，並對他的詞風稍加評論。

中主詞中最有名的爲兩闋〈浣谿沙〉：其一爲

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　細雨夢回鷄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闌干。[137]

詞中流露出衆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一片惆悵無奈，令人惋惜難堪。其二爲

[135] 雖然王國維又增補了兩闋，但有人以爲那兩闋非爲中主，而應爲蘇軾及宴殊的作品。見唐圭璋，《南唐二主詞彙箋》（1937初版，台北：正中書局，1966三版），頁23a～24a。

[136] 見詹安泰，《李璟・李煜詞》（北京：人民文學，1958），頁49～51，其中對二主詞的歷代版本予以介紹。

[137] 此據唐圭璋本，頁2b；李調元《全五代詩》，卷24，頁381上所載文字與此稍異，如「鷄塞遠」作「清漏永」；「多少淚珠何限恨」作「簌簌泪淚珠多少恨」；又「寄闌干」作「倚闌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手捲真珠上玉鈎，依然春恨鎖重樓，風裡落花誰是主，思悠悠。　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三楚暮，接天流。(139)

詞中以女子口氣，寫春愁孤獨，空虛寂寞，思緒無端之苦。以上這二闋詞藉景寫春愁秋恨，反映了中主寂寞無奈的內心世界與多情善感的個性。這兩闋詞原是中主在偶然中寫成，賜給宮中擅於歌唱的伶人王感化的作品。中主過世後，王感化將它們呈獻給後主，因此得以保全下來。(138)

其次爲他的另外兩闋詞，分別爲〈應天長〉：

一鈎新月臨妝鏡，蟬鬢鳳釵慵不整。風不靜，層樓迥，惆悵落花風不定。　柳堤芳草徑，夢斷轆轤金井。昨夜更闌酒醒，春愁過卻病。(140)

此闋以女子口氣寫閨怨，表達她心情寥漠，行動慵懶，在孤獨的環境中喝悶酒，及寂寞難眠的情景。又、〈望遠行〉：

碧砌花光錦繡明，朱扉長日鎮長扃，餘寒不去夢難成。爐香烟冷自亭亭。　遼陽月，秣陵碁，不傳消息但傳情。黃金窗下忽然驚，征人歸日二毛生。(141)

此闋同樣以女子的語氣，描寫她在春光明媚中，孤獨無依，日則望朱扉長鎖，夜則難以入夢，心中懸念良人遠征之苦。

此外，王國維又補二闋〈浣谿沙〉，認爲是中主的作品。其一爲：

風壓輕雲貼水飛，乍晴池館燕爭泥，沈郎多病不勝衣。　沙上未聞鴻雁信，竹間時有鷓鴣啼，此情惟有落花知。(142)

其二爲：

(138) 見唐圭璋本，頁2a。
(139) 此事見載於馬令，《南唐書》，卷25，頁99～100，王感化傳。
(140) 見唐圭璋本，頁1a。
(141) 見唐圭璋本，頁1a～2b。
(142) 見唐圭璋本，頁23a～b。李調元，《全五代詩》，卷24，頁381～382，列此爲中主的詩作。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樓台，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143)

這兩件作品，唐圭璋認爲極可能分別爲蘇軾和宴殊之作，並非中主所寫。(144)

根據謝世涯的研究，中主詞風有以下的四個特色：1. 字句靈活運用，無板滯生硬之感；2. 章法多轉折，而情感表達直接；3. 語言爽利，不雕琢，常用白描口語；4. 詞風委婉哀怨，間有沈鬱之氣。(145) 以作者個人管見，中主詞中所流露的那種淒然的心情，一則與他溫和而消極的個性有關；另外則與他所處的環境有莫大的關連。由於南唐長年的戰爭壓力，以及後來因戰敗曲辱所引發強烈的挫折感，致使中主在他詞中流露出來的已不是單純的閑愁，而是在他內心深處一種難以排遣的寂寞、無奈、以及面對時光的流逝和環境的變化所產生的無力感。就這一點來看，中主的詞又和馮延巳的詞有相當的類似性。(146)

詞的起源與發展，一般以爲始於中、晚唐的白居易、劉禹錫、和溫庭筠等人。五代盛行，以後蜀趙崇祚和歐陽炯蒐集的《花間集》爲代表。集中收錄了十八家詞人，多爲蜀人。十八家之中又以溫庭筠與韋莊兩人分別爲溫婉與豪放兩種詞風的代表。(147) 溫詞婉約，多以客觀語氣，細膩地描寫女子容顏和肌膚之艷麗，以及景物擺設的精緻，還有她們深閨無聊的相思之苦。韋詞擅於直接抒情，多以主觀用詞表達真率的感情。他的作風影響到南唐的馮延巳、中主、以及後主。(148) 雖然中主詞中仍然免不了沿用《花間集》那種以女子的語氣來表達自己的情思，但是他的愁思憂悶已不止是言情，而似已觸及到人生虛無的本質問題，因而「能夠帶著直接的興發感動的力量造成一

(143) 見唐圭璋本，頁23b～24a。
(144) 見唐圭璋，《南唐二主詞彙箋》，頁23a～24a。
(145) 參見謝世涯，〈南唐李后主詞研究〉，頁9～12。
(146) 參見葉嘉瑩，《溫庭筠・韋莊・馮延巳・李煜》（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馮延巳〉篇，頁110～114。馮延巳詞見王次聰重校《陽春集》（台北：世界書局，1965）；又參見鄭騫，《從詩到曲》（台北：科學出版社，1961），頁110～112。
(147) 見趙崇祚，歐陽炯，《花間集》，宋紹興本，附李一氓校，李冰若注（台北：鼎文書局，1974）。
(148) 關於溫庭筠和韋莊詞的研究，論著很多，參見鄭騫，《從詩到曲》，頁103～109；及葉嘉瑩，前引書；姜尚賢，《溫韋詞研究》（台南，1971）；劉金城，《韋莊詞校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其後附有夏承燾，〈韋莊年譜〉。

臺灣大學藝術 期刊資料庫

種意境」，並以此開創了南唐詞的特色。[149]

4. 獎勵文風

在中主的教育和影響之外，他的諸子也多能詩文：長子弘冀曾有詩集；[150] 六子從嘉（煜，後主）更曾著《雜說》百篇，及詩詞多首；[151] 七子從善和九子從謙也都能詩。[152] 此外，諸王、朝中大臣、和在野隱者能詩文的更不勝枚舉，比較有名的有宋齊丘、韓熙載、馮延巳、李建勳、徐鍇、徐鉉、張佖、鍾蒨、陳元裕、孟賓于、伍喬、孫晟、李中、唐希雅、陳陶、陳貺、江爲、和劉洞等一百多人。[153] 而君臣之間以詩詞互相酬答與諧謔則爲常有的事。最有名的是中主與馮延巳的例子：

> 馮延巳……著樂章百餘闋，見稱於世。元宗樂府辭：「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巳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皆爲警册。元宗嘗戲延巳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延巳曰：「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悅……[154]

至於君臣一同宴遊作詩相和也非稀奇之舉，比如上述保大五年，中主自作〈賞雪詩〉後，又命徐鉉、李建勳、和張義方和詩以進。[155] 徐鉉在他的《騎省集》中便收了許多這類應制之作。[156] 而這些詩人彼此之間互有酬答，更有因爲志趣相投，而結爲詩社的例子。這種情形在烈祖時期已經發生，比如李建勳、沈彬、和孫魴等人，便曾結過詩社。[157] 如此，朝野崇尚

[149] 參見葉嘉瑩，前引書，頁111。
[150] 徐鉉曾爲他作〈文獻太子詩集序〉，見《騎省集》，四庫全書，册1085，卷18，頁143。
[151] 參見陸游，《南唐書》，卷3，頁36；唐圭璋，《南唐二主詞彙箋》；李調元，《全五代詩》，卷24，頁383～388。詳情將在另文專論後主的部份討論。
[152] 他們的作品見李調元，《全五代詩》，卷24，頁388～389。
[153] 參見馬令，《南唐書》，卷7，頁33～36，諸王傳；又見李調元，《全五代詩》，卷24～39，頁381～622。又，劉承幹，《南唐書補注》（1795序）（嘉業堂刻本），卷15，頁5b～6b，又補列南唐詩人十多人。
[154] 馬令，《南唐書》，卷21，頁84。
[155] 鄭文寶，《江表志》，卷2，頁137～138。
[156] 見徐鉉，《騎省集》，卷21，頁162～164。
[157] 見馬令，《南唐書》，卷13，頁58，孫魴傳。

文章，一片儒雅。南唐文風鼎盛的情況超過同時各國。作者根據李調元《全五代詩》一書中所輯，統計得南唐詩人至少一百人，作品至少1031首以上，爲當時各國之冠，下列簡表可以爲証：

國　　別	詩人	作品	卷	頁
後梁（907～923）	59	777	1～8	1～147
後唐（923～936）	33	274	9～11	149～199
後晉（936～946）	12	32	12	201～212
後漢（947～950）	9	74	13～14	213～240
後周（951～960）	29	234	15～17	241～294
吳（902～937）	27	424	18～23	295～380
南唐（937～975）	103	1031	24～39	381～622
前蜀（907～925）	47	1026	40～56	623～860
後蜀（934～965）	43	220	57～60	861～918
南漢（917～971）	24	42	61	919～931
楚（927～951）	60	243	62～65	933～989
吳越（907～978）	49	636	66～74	991～1134
閩（909～944）	31	940	75～87	1135～1331
荊南（925～963）	12	812	88～79	1333～1477
北漢（951～979）	4	38	100	1479～1488

[158]

至於大臣中博通經史的儒者更不計其數，比較有名的如游簡言、常夢錫、孫晟、韓熙載、陳喬、鍾謨、高越、江文蔚、孫魴、徐鍇、徐鉉、湯悅、和蕭儼等人。[159] 。以上這些南唐詩人和學者的著作，有許多在北宋時期還流傳於世，且在1041年被歐陽修和王堯臣收編在《崇文總目》中。[160]

[158] 此據李調元，《全五代詩》統計所得。由於李書未將作家的詩與詞嚴加區分，而都同列一處，因此本表所稱「詩人」乃泛指能詩與詞的文人。
[159] 見諸人傳記，載於馬令，《南唐書》，卷10，頁45（常夢錫）；卷13，頁56～57（韓熙載）；同卷，頁57～58（江文蔚，高越，孫魴）；卷14，頁62（徐鍇）；卷22，頁81（蕭儼）；卷23，頁94（徐鉉），頁95（高越）。
[160] 參見王堯臣等編次，錢東垣等輯釋，《崇文總目》，叢書集成，册12～15（台北：商務印書館，1965），頁331，351，352，356，357，364，371，380。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5. 設學與貢舉

在獎勵詩文創作之外，中主也有計劃地推行儒家教育，具體的措施包括學校的設立和貢舉的舉行。南唐學校的設立始自烈祖時期。當時缺書，因此多向國內私人藏書者徵集，這可從《南唐書》魯崇範傳中得知：

> 魯崇範廬陵人也，窶薪不屬而讀書自若。烈祖初建學校，丁亂世，典籍多闕，旁求諸郡。崇範雖窶，九經、子、史世藏於家。刺史貫皓就取進之。薦其名，不報。皓以己緡償其值。崇範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亂藏於家，世治藏於國，其實一也，吾非書肆，何估直以償耶？」卻之。……會皓赴闕，與崇範俱至金陵，表薦之，召試東宮，授太子洗馬……元宗即位，尤重之，除東宮使，卒於仕。[161]

所設的學校包括秦淮河畔的國子監、國子學、和廬山的國學、以及地方州學。[162] 廬山國學又稱白鹿洞學館，設於烈祖昇元四年（940），爲當時講學、授徒、和作育人才的書院。[163] 保大時期主持金陵國子監的有「祭酒」何溥，「司業」江夢孫和鍾謨；主持國子學的有「國子博士」陳覺和周惟簡等；主持廬山國學的先有「洞主」李善道，後主時代則有「國子助教」盧絳和朱弼等人。[164] 南唐偏安江南，維持三十多年的安定，有計劃地設學育才，這種重視文教的措施，遠較其他各國爲先進，影響所及，使南唐社會敦睦祥和。馬令對此深爲贊許：

> 嗚呼！學校者國家之矩範，人倫之大本也。唐末大亂，干戈相尋，而

[161] 見馬令，《南唐書》，卷18，康隅傳，頁73。

[162] 參見高明士，〈五代的教育〉，《大陸雜誌》，1971年，43卷，6期，頁22～43，南唐部份見頁25～27。

[163] 據劉承幹，《南唐書補注》，卷15，頁6a～b：「白鹿洞書院…在南康府北、廬山五老峯下。唐貞元中洛陽人李渤與其兄涉隱居九江，讀書于此…南唐昇元中即其地建學置田，號曰廬山國學…」。又，參見李善馨發行，《中國書院史話》（台北：學海出版社，1985），頁1～2。又參見無名氏，《南唐史》，學校與貢舉條，頁181～196。

[164] 參見高明士，〈五代的教育〉，頁27；又參見馬令，《南唐書》，卷22，頁88～89，盧絳傳；卷23，頁91～92，朱弼傳。

> 橋門壁水鞠爲茂草。馴至五代，儒風不競，其來久矣！南唐跨有江淮，鳩集典墳，特置學官，濱秦淮開國子監。復有廬山國學，其徒各不下數百。所統州縣，往往有學。方是時，廢君如吳越，弒主如南漢，叛親閩、楚，亂臣賊子無國無之。唯南唐兄弟輯睦，君臣奠位，監於他國，最爲無事，此亦好儒之效也……[165]

中主時期選拔人才最重要的措施之一，便是在保大十年（952）正式開始舉行貢舉，此後定期舉行，直到南唐滅亡那一年（975）爲止。在此之前已有初步的考試辦法，施行於烈祖時代和中主早期。那便是獻書和考試這兩種方法合用。這在張延翰的傳中說得很清楚：

> （烈祖）時貢院未備，士有獻書可採者，隨即考試，公平詳審，士論美之。〔延翰〕兼知選事，吏不容姦，畏之如神明。進擢孤寒，不附貴勢。[166]

中主由於愛好文學，取士難免偏好此道，朝中大臣能文學者，多得重用。據《資治通鑑》：

> 唐主好文學，故熙載、馮延巳、延魯、江文蔚、潘佑、徐鉉之徒，皆至美官……當時唐之文雅於諸國爲盛，然未嘗設科舉，多因上書言事拜官。[167]

到了保大十年，中主才正式下詔設科舉，由江文蔚掌理此事，以爲取才來源。然而，此事才開始一年，卻因權臣反對而一度中止：

> 至是，始命翰林學士江文蔚知貢舉…時執政皆不由科第，相與沮毀，竟罷貢舉…[168]

[165] 馬令，《南唐書》，卷23，頁91。

[166] 馬令，《南唐書》，卷10，頁47。

[167]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90，頁9474。

[168] 同上注。又此年得進士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參見吳任臣，《十國春秋》，卷16，頁12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次年，由於徐鉉力爭，言「貢舉初設，不宜遽罷，乃復行之。」[169] 於是才又在第二年（保大十二年）二月命朱翌知貢舉。[170]

由以上貢舉之罷設過程，又可看出中主一朝黨爭的現象：贊成貢舉的，多爲原屬中原進士出身後來投奔南唐的儒者，包括主試者江文蔚。他原本是「後唐長興（930～933）中舉進士，爲河南府巡官。避權勢，有高才」。[171] 還有韓熙載。他本是「北海人也。弱冠擢進士第……同光（923～924）末…奔於吳」。[172] 韓熙載後來也曾主持過貢舉，舒雅便是他取爲第一的進士。[173] 而反對貢舉的當朝「執政」多爲「不由科第」的江南當地人，包括了宋齊丘和馮延巳等人。宋齊丘被任用是由於他善於謀略，因此權重於烈祖和中主兩朝。馮延巳之得權是因他擅於文辭，因此烈祖命他陪侍中主，以此緣故，後來才在中主朝爲宰相。這些非由科舉出身的人，恐懼將來新進人才會經由科舉系統與反對黨相結合，而與他們抗衡，因此極力設法制止。但此事最後還是贊成派勝利。

科舉終於在南唐實行。此後，一直到南唐滅亡的二十二年之間（953～975），總共舉了十七次貢舉，選取進士九十三人。[174] 在這種情況下選拔出來的南唐較有名的進士，在中主朝有江爲、郭昭慶、何喬、張洎、宋貞觀、和徐鍇；後主朝則有舒雅和丘旭等人。[175] 按唐亡後，科舉在中原五代各朝仍有舉行；而十國中的後蜀也設有學校。[176] 南唐則兼而有之，可見其文化建設的積極與成就。如此，南唐儒學在上行下效，又配合學校教育和科舉制度的推展下，達到盛況。南唐的文風璀璨，是五代十國之中文化程度最高的地區，幾乎可以比美中唐盛況。馬令在《南唐書》〈儒者傳〉的序文中，對此特別讚譽：

[169] 見司馬光，《資治通鑑》，頁291，頁9498。
[170] 見吳任臣，同上註。
[171] 見馬令，《南唐書》，卷13，儒者傳，頁57。
[172] 馬令，《南唐書》，卷13，頁156。
[173] 馬令，《南唐書》，卷22，頁88。
[174] 進士人名，據《江南通志》載十名，《江西通志》載七名，見劉承幹《南唐書補注》，卷3，頁22a～b，及卷15，頁8～11a；南唐又設有童子科，見同書。又參見無名氏，《南唐史》，頁181～196，〈貢舉〉條。
[175] 諸人傳記，見馬令，《南唐書》，卷14，頁59～62；卷22，頁88；卷23，頁93。
[176] 分別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90，頁9474；卷291，頁9491。

……五代之亂也，禮樂崩壞，文獻俱亡，而儒衣書服盛於南唐，豈斯文之未喪而天將有所寓歟？！不然則聖王之不興掃地盡矣！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見於載籍，燦然可觀：如韓熙載之不羈，江文蔚之高才，徐鍇之典贍，高越之華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價於一時。而徐鉉、湯悅、張洎之徒，又足以爭名於天下。其餘落落不可勝數。故曰：「江左三十年間文物有元和之風。」豈虛言乎？[177]

6. 妙解音律

在這裡所談的「音律」是指純藝術娛樂性質，而不包括宗廟祭典的音樂。中主「善曉音律」，[178] 而且對樂器相當有研究。他曾因爲親理樂器，而被烈祖怒責，以爲將爲人君的他，不應費心思在那種雕蟲小技之上。[179] 中主自己也珍藏名貴的樂器，比如一具自東漢蔡邕（133～192）時留下來的希世古琴，名爲「燒槽琴」或「焦尾琴」。後來因後主的大周后「尤工琵琶，嘗爲壽元宗（中主）前。元宗歎其工，以燒槽琵琶賜之。」[180] 這把琵琶在大周后去世（964）後仍流傳於世，到宣和年間還在，後來在靖康之亂（1127）後才失落。[181] 此外，在這方面具有才華的人，也吸引中主的興趣，如「李冠，善吹中管，嘗預宋齊丘夕宴，當坐吹噓，聲韻悠揚，清入霄漢。元宗聞其名，屬閩、楚多故，戎務日繁，不獲召見」。[182]

總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此時南唐的樂舞之風相當盛行。大臣之中也有善解音律的，如韓熙載便是「審音能舞」之人。[183] 而許多達官貴人也多耽於此，甚至發展成糜爛的生活方式（這點本文稍前已經討論過）。而今存最有名的《韓熙載夜宴圖》（圖2：A, B）中所描繪的許多樂舞場面，正

[177] 馬令，《南唐書》，卷13，頁56，儒者傳序言。
[178] 見鄭文寶，《江表志》，卷2，頁135。
[179] 見陳彭年，《江南餘載》，四庫全書，冊464；又見馬令，《南唐書》，卷6，頁27，種夫人傳。
[180] 馬令，《南唐書》，卷6，頁28；陸游，《南唐書》，卷13，頁73。
[181] 參見夏承燾，《南唐二主年譜》，頁30。
[182] 馬令，《南唐書》，卷24，頁96。
[183] 見馬令，《南唐書》，卷13，頁57。

臺灣大學藝術 期刊資料庫

好反映這時代的風尚。[184]

7. 擅長書法

中主擅長書法，師承羊欣，十得八九。[185] 他能作隸、楷、和草書等不同書體。可惜的是，隨著南唐的滅亡，他的書跡也多不存。北宋徽宗時，內府僅藏有他的正書三件。[186] 此外，僅有前述的幾件石刻碑文倖能傳世，如〈祭悟空和尚文〉，和〈四祖塔院疏〉等。[187] 正楷和篆、隸大多用於正式場合，如前述中主爲悟空和尚所作的「祭文」，以及爲四祖塔院所作的「疏」，即以楷書寫碑文，而以篆書題碑額（前者碑額爲韓熙載所篆）。但是草書則多爲即興之作。中主擅寫草書，態度輕鬆自然。他有時甚且容許臣下在他作品之後摹仿他的書法作字：

> 李家明廬州西昌人，談諧敏給，善爲諷辭。元宗好遊，家明常從……家明母死，未葬。會元宗乘閒書草字於便殿，家明紿曰：「臣竊署字，與之不疑。」元宗以麻紙大押字命試學焉。家明輒於草字上署曰：「宜州上供庫支錢二百緡付李家明葬母。」元宗大笑，因以賜焉……[188]

中主習書，自是受到烈祖影響。他也承繼烈祖的圖書和書法收藏。在他不斷蒐求古跡之下，「宮中圖籍萬卷，鍾、王墨跡尤多」。[189] 他並在這些

[184] 今本《韓熙載夜宴圖》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原傳爲南唐顧閎中所畫，學者所見各有不同。最近余輝以爲可能是南宋院畫家在1233年之前的作品，參見其〈《韓熙載夜宴圖》卷年代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993），4期，頁37～56。

[185] 陸游，《南唐書》，卷13，保儀黃氏傳，頁74。

[186] 見《宣和書譜》，四庫全書，冊813，頁234。

[187] 見注[97]及[99]；另外，據南宋陳思所記，在浙江台州有一石刻書〈杜牧九日登高詩〉，託名爲中主所作，當時已有學者辨其爲僞。參見陳思，《寶刻叢編》，四庫全書，冊682，卷14，頁410；闕名，《寶刻類編》，卷1，頁591。

[188] 馬令，《南唐書》，卷25，頁99。

[189] 陳彭年，《江南別錄》，頁128；馬令，《南唐書》，卷6，頁31；陸游，《南唐書》，卷13，頁74。

珍貴的收藏品上，鈐上他的收藏印記，包括「合同」，及「集賢院」印。[190] 這種講究書法技能，以及收藏圖籍的風氣，在南唐也相當普遍。當時的大臣中，也有許多擅於書法的，如韓熙載「能分書及畫，名重當時」；又如徐鉉、徐鍇、常夢錫、王文秉（炳）、和孟拱辰等人。他們的書法到南宋時還保存在許多石刻碑文上。[191] 由於朝中重視書法，因此，書法也成了政治遊戲的一部份，如馮延巳擅書而卻不惜自貶身價，以阿諛根本不擅書卻又目中無人的宋齊丘：

> 齊丘爲文有天才而寡學……自以古今獨步，書札不工，亦自矜衒，而嗤鄙歐、虞之徒。馮延巳亦工書，遠勝齊丘，而佯爲師授，以求媚齊丘，謂之曰：「子書非不善，然不能精，意往往似虞世南……」[192]

又有沙門因擅長文章與書法而授官的，如僧應之：

> 能文章，習柳氏筆法，以善書冠江左。初舉進士，一黜於有司…遂學爲浮屠。保大中授文章應制大德…[193]

至於私人藏書風氣亦盛，如前述的魯崇範藏九經和子、史諸書於家，因烈祖始設學校而獻出，因此中主對他特別禮遇。又、當時有一些北方來歸的隱士、學者，除了自己著書之外，往往有重要的藏書，如朱遵度、鄭元素、陳褒、和陳貺等人[194]：

> （朱遵度）本青州書生，好藏書。高尚不仕，閒居金陵，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群書麗藻》一千卷，《漆經》數卷，皆行於世……[195]

[190] 見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1059序）（台北：漢華公司據中央圖書館藏本重印，無出版年月），頁5a～b，〈竹夢松〉條。

[191] 分別見馬令，《南唐書》，卷13，頁57；及陳思，《寶刻叢編》，卷15，頁449～451，453，457。

[192] 馬令，《南唐書》，卷20，頁81，宋齊丘傳。

[193] 馬令，《南唐書》，卷26，頁102。

[194] 參見高明士，〈五代的教育〉，頁33、35。

[195] 鄭文寶，《江表志》，卷2，頁1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隱者鄭元素更藏有古書千餘卷。最重要的是，他擁有出自唐太宗昭陵中的許多前代圖書及鍾、王墨跡：

> （鄭元素）京兆華原人也…避亂南遊，隱於廬山青牛谷，高臥四十餘年……構椽剪茅，於舍後會集古書殆至千餘卷。元素，溫韜之甥也，自言韜發昭陵，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閑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爲多。[196]

這些藏書和墨跡不論它們的流傳和應用效率的高低，它們的存在，反映了南唐社會文化資源的豐富。

中主珍愛所藏歷代書蹟。爲便於學習臨摹，他曾在保大七年（949）十二月「命倉曹參軍王文炳摹勒古今法帖上石」。[197] 陶宗儀認爲這應是《保大帖》。它與後主時命徐鉉刻的《昇元帖》和《澄清堂帖》，成爲著名的南唐三帖。南唐三帖的重要性在於它們後來成爲北宋太宗在淳化三年（992）命王著刻的《淳化閣帖》的祖本，也就是中國歷代法帖的祖本。[198] 清代姜紹書認爲石刻書蹟早行於上古及秦、漢時代，但字蹟較大且多見於豐碑與摩崖；像拓本式可以裝訂成冊，供案頭欣賞和學習的帖刻，則始自南唐。[199]

其實，以木版刻經、刻書、和刻畫像的風氣，在唐代中期和五代之間已經盛行。英人斯坦因（Aurel Stein）在1908年從敦煌藏經洞中拿走的一卷木版刻印《金剛經》，上面紀年爲「唐懿宗咸通九年（868）」；以及另一件《毗沙門天》畫像，上面紀年爲「後晉開運四年」（天福十二年，947）。[200] 此外，五代時中原的後唐明宗也曾命屬下校九經，刻板印行。因此，雖處亂世，但九經的流布相當廣。[201] 又、保大十一年（953），在

[196] 馬令，《南唐書》，卷15，頁65。又鄭元素隱居處見吳宗慈，《廬山志》，冊2，卷4，頁502；冊3，卷9，頁805。

[197] 吳任臣，《十國春秋》，卷16，頁9b。

[198] 後主時因已奉宋正朔，南唐已無年號，故所刻法帖名用烈祖「昇元」之名。關於南唐三帖及《淳化閣帖》的關係，見林志鈞，《帖考》（無出版地，1962），頁1～14；15～31。

[199] 見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四庫全書，冊872，卷下，頁107。

[200] 這兩件作品都藏於倫敦的大英圖書館，圖版見於Roderick Whitfield, *The Art of Central Asia*（London and 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83）, Vol. 2, Figs. 144, 153.

[201] 事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91，頁9495。

四川的後蜀也因興辦學校而刻板印九經，以應教學所需。[202] 可知中唐以來雕板印刷書籍和經帙的風氣逐漸流行。南唐此時摹刻書法上石，印製法帖，以供案頭研習、欣賞、和臨摹，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時代潮流之所趨，另一方面更可看出南唐之重視書法的程度，可以比美中原和四川地區之重視佛、儒二家經典。

8. 贊助繪畫

中主不會畫，但卻是個熱心的贊助者。南唐的繪畫在他和後主的支持與推動下，發展蓬勃。有關中主的畫像已於前面討論過，不再贅述。[203] 至於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那幅傳爲周文矩所作的《重屏會棋圖》，據單國強先生的說法，認爲應是宋人摹本。[204] 此畫縱非原本，但必有所根據，因此可以看出中主形貌的大概。原本經南宋王明清比對廬山圓通寺的中主肖像，發現絲毫不差。[204] 這類描寫帝王閑居燕樂的記實之作，有如今日的攝影存真，在當時十分普遍。就如前面談過的，保大五年元日大雪，中主與諸弟賞雪賦詩，當時便召來一群畫家爲他們的宴樂圖寫紀勝：

> 保大五年元日大雪。上詔太弟以下登樓展燕，咸命賦詩。令中使就私第賜李建勳。建勳方會中書舍人徐鉉、勤政殿學士張義方於浮亭，即時和進。元宗乃召建勳、義方同入，夜艾方散。侍臣皆有圖有詠。徐鉉爲前後序。太弟以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元（源）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無非絕筆…[205]

可惜文中未提到底是那個畫家爲中主寫真。要到北宋郭若虛的《圖畫見聞志》中才說畫中主真容的是高冲古。[206] 由此看來，這些畫家當必供職宮

[202] 同上，卷291，頁9491。

[203] 見注⑪。

[204] 見注⑫。

[205] 鄭文寶，《江表志》，卷2，頁137～138；陳彭年，《江南餘載》，頁158；吳任臣，《十國春秋》，卷16，頁6。又、此事夏承燾以爲發生在保大七年，見注⑬。

[206] 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畫史叢書本（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卷6，頁237，〈賞雪圖〉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廷，因此才能隨傳隨到。

依作者的觀察，這群畫家的身份共屬兩種：一爲隸屬翰林院的專業畫家，也就是後代習稱的畫院畫家；一爲本職屬低階朝官而兼能繪畫者，如董源便是。以下我們先看院畫家的問題。一般人認爲南唐已有畫院，他們主要根據的証據是趙幹的《江行初雪》圖卷上，李後主題字：「江行初雪。畫院學生趙幹狀。」[207] 但是南唐畫院的情況如何，卻無其他資料可查。作者以爲南唐畫院是隸屬於翰林院之下的一個小單位，開始運作於烈祖昇元年間。原來翰林院起源於唐代，開始時收編了各種伎藝之士，包括詞學、經術、冶煉、僧道、卜祝、藝術、書奕等等。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738）正式稱呼供職於翰林院的這些伎藝人士爲「翰林學士」。但是，其中那些擅於詞學之士由於專司文辭，在禁中起草詔命，參預機要，自覺身份地位日趨重要，不屑與其他伎藝雜流同處，因而獨立爲「學士院」。其他伎藝之流則仍屬翰林院，而畫家便是其中的一部份成員。[208] 烈祖在建國後，典章制度一仍唐舊，這方面也承襲舊法。可知南唐的院畫家是屬於翰林院的編制。他們的職掌包括爲皇室和朝廷作畫。昇元年間翰林院有畫契丹入貢的事：

> 昇元二年（938）……是歲契丹主之弟東丹王亦遣使以羊馬入貢……八月契丹王遣梅里褁盧古來聘……於是翰林院進《二丹入貢圖》。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贊以美之。[209]

上述保大五年畫中主賞雪圖的畫家大多是院畫家中的佼佼者。他們的資料分別見於北宋三部重要的畫史中：劉道醇的《聖朝名畫評》（1059），郭若虛的《圖畫見聞志》（1074）及徽宗敕編的《宣和畫譜》（約1120左右）。其中高冲古與高太冲應爲同一人：

> 高太冲，江南人，工傳寫，事李中主爲翰林待詔，當寫李中主真，得其神思。[210]

其他畫家如周文矩，他曾任烈祖、中主、和後主三朝的翰林待詔：

> 周文矩，建康句容人，美風度、學丹青，頗有精思。仕李煜爲待詔，能畫冕服、車器、人物、子女。僞昇元中，命圖南莊，最爲精備。開寶中，煜貢之，藏於秘府，爲上寶重。[211]
>
> 朱澄，事江南爲翰林待詔，工畫屋木。李中主保大五年，嘗令與高太冲等合畫《雪景宴圖》，時稱絕手。[212]
>
> 徐崇嗣、崇勳者，熙之孫也，善畫草蟲、時果、花木、蠶蟹之類，尤喜爲連樹及墜地棗，備得形似，無有及者。士大夫謂二徐有祖之風。[213]
>
> 董源，字叔達，鍾陵人，事南唐爲後苑副使，善畫山水。水墨類王維，著色如李思訓。兼工畫牛、虎。肉肌豐混，毛毳輕浮，具足精神，脫略凡格……[214]

這其中比較特別的是董源。他的官銜是「後苑副使」，不屬於翰林院。他的本職應是宮廷中位階較低的官，但又以擅長繪畫聞名，並非專職的院畫家。與董源這種情形類似的，還有當時的著名畫家竹夢松，他的官職是「東

---

[207] 圖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題記，參見故宮博物院，《故宮書畫錄》，（台北：故宮博物院，1965），冊2，卷4，頁17。

[208] 關於翰林學士的演變，參見楊果，〈翰林学士與宋代政治初探〉，收於鄧廣銘與漆俠等編，《宋史研究論文集》（河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7），頁49～76，特別是49～51。

[209] 吳任臣，《十國春秋》，卷15，頁8a。

[210] 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3，頁194；此與同書卷6，頁237，《中主賞雪圖》的高冲古所言之事相同，二人應當爲同一人而用名不同。

[211] 劉道醇，《聖朝名畫評》（台北：漢華圖書公司，1974），卷1，頁8a～b；又參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3，頁188；卷6，頁237，《中主賞雪圖》條；又參見《宣和畫譜》，畫史叢書本，卷7，頁443～445。

[212] 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4，頁210。

[213] 劉道醇，《聖朝名畫評》，卷3，頁4a～b；又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1，頁159；卷4，頁203；卷6，頁234，頁237中記其參予《中主賞雪圖》事；另見《宣和畫譜》卷17，頁583～587，此處「崇勳」作「崇矩」，異於他書。

[214] 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3，頁183；卷6，頁237記其參予《中主賞雪圖》之事；又見《宣和畫譜》，卷10，頁485～487。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川別駕」，但也兼事繪畫：

> 竹夢松，建康溧陽人，亦潛心圖畫，長於人物子女，洎宮殿景致。仕僞南唐李璟爲東川別駕。予嘗於判太原府侍郎王公第，見夢松畫春景士女一軸。（上有璟僞「合同」印，及「集賢院」印記並存焉。）其布景命意，綽約體態，得周昉之格。[215]

類似情形在當時朝臣中也所在多有，比如宰相孫晟、韓熙載、及江彬等人。不過由於這些朝臣身居高官，身份不同，又他們以畫爲遣興之作，更不像院畫家那般應制作畫：

> （孫晟）好學，有文辭，尤工於詩。少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畫唐詩人賈島像置於屋壁，晨夕事之。[216]

又如韓熙載的「分書及畫名重當時」。[217] 以及烈祖時文人江彬曾獻《畫山水詩》，烈祖授他校書郎的官職，或許沈彬也能畫。[218]

除上述這些畫家之外，活動於中主時期的南唐畫家還有以下數人：

> 曹仲元，建康豐城人，少學吳生，攻畫佛及鬼神，仕僞南唐李璟爲待詔。仲元凡命意搦管，奪吳生意思，時人器之。仲元後乃頓棄吳法，自立一格，而落墨緻細，傅彩明澤，南州士人咸器重之。後璟嘗命仲元畫寶志公石壁，冠絕當時，故江介（左）遠近佛廟神祠尤多筆跡。[219]

> 陸晃，嘉禾人，性疎逸，不脩人事，好交尚氣。每沈湎於酒，亦善丹艧。多畫村野人物。凡酒興情逸，遇筆揮洒，出於臨時，略不預構，故妍醜互出。或在絕格，或入末品。時僞南唐李璟常聞晃名，欲召之。會侍者譖之，以謂晃好把酒歌舞，無臣子之禮。璟由是疏遠之。[220]

> 陶守立，池陽人。江南李後主〔應爲中主〕保大間應舉下第，退居齊山。以詩筆丹青自娛，工畫佛、道、鬼、神、山川、人物，至於車馬、台閣、筆無偏善。嘗於九華草堂壁畫《山程早行圖》，及建康清涼寺有《海水》、《李後主》，金山水閣有《十六羅漢像》，皆振妙於時也。[221]

此外又有李景道和李景遊，兩人都是南唐皇室成員：

> （李景道）僞主李昇之親屬……景道善丹青，而無貴公子氣，蓋亦餘膏賸馥所沾丐而然……

> （李景遊）亦僞主昇之親屬，與景道其季孟行也。一時雅尚，頗與景道同好。畫人物極勝……璟嗣昇，而諸昆弟皆王，獨景遊不見封。其畫世亦罕得其本。[222]

以烈祖諸子名字都取「景」字來看，景道和景遊應當與中主（原名景通，登基後改名璟，958年後改爲景以避周世宗之父諱）同輩。但兩人都不見於正史，依此情況推論，他們或爲烈祖的侄輩也未可知。

總之，中主時代由於君主好藝，而戚屬效從，是以畫家輩出。縱觀以上資料，得知中主時代的畫家身份包括皇親、大臣、及院畫家，當然在這之外，還有民間畫家（由於資料從缺，不易考証）。總計知名者至少有以上的十五人。可惜他們的作品多已佚失，其中雖有少數存世，但是本身又有真僞問題待考，由於牽涉的層面太廣，又限於篇幅，因此作者將俟來日另外撰文討論。

---

[215] 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1059）（台北：漢華出版社，1974），頁4b～5a。
[216] 馬令，《南唐書》，卷16，頁68。
[217] 馬令，《南唐書》，卷13，頁57。
[218] 馬令，《南唐書》，卷15，頁63，江彬條。又、孫晟、韓熙載、及江彬能畫之事，陸游，《南唐書》皆不載。
[219] 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頁4a；又類似傳記，參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1，頁158；卷2，頁177；《宣和畫譜》，卷3，頁406～407。

[220] 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頁5b；陸晃傳又見於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2，頁177～178。
[221] 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2，頁177。
[222] 以上二人傳皆見《宣和畫譜》，卷7，頁4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結語

以上是作者綜合史料所見的南唐中主：一個個性中充滿矛盾的謙謙君子。就本質上而言，他是天生的藝術家，成功地領導當時的文藝活動，在各方面提昇了南唐的文化建設。但是，從角色上來看，環境使他扮演南唐的皇帝，他無法勝任的結果，成了失敗的政治家，把南唐帶到衰亡的邊緣。藝術與政治兩者在本質上原本是相互衝突的：藝術貴於凡事純情、率真、執著、投入；政治則要求處世冷靜、理性、機智、巧變。中主不幸而集這兩種要求於一身，又無力使這兩種力量保持平衡，因而引發了個性與角色的衝突。衝突的結果造成了他個人以及整個皇朝的悲劇。這個不幸的悲劇並未因中主的逝世而結束，它更殘忍而具體地在後主的身上重演，終至南唐覆亡、後主被虜而後已。此爲後話，作者將另外撰文探討。

參考書目（依引用順序）

馬令，《南唐書》，四部叢刊，冊12（台北：商務印書館）

周在浚，《南唐書注》，18世紀初年，嘉業堂刻本

陸游，《南唐書》，四部叢刊，冊12（台北：商務印書館）

曾昭燏等編，《南唐二陵發掘報告》（南京：文物出版社，1957）

諸葛计編，《南唐先主李昇年譜》（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

陳葆真，〈南唐烈祖的個性和文藝活動〉，《美術史研究集刊》，2期（1995），頁27～46。

龍袞，《江南野史》，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影印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本，1983），冊464

夏承燾，《南唐二主年譜》（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1955年版）

陳彭年，《江南別錄》，四庫全書，冊464

無名氏，《釣磯立談》，四庫全書，冊464

吳任臣，《十國春秋》（康熙八年，1670序）（台北：國光書局影印，無出版年月）

王明清，《揮麈三錄》，四庫全書，冊1038

中國美術全集編委會，《中國美術全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繪畫編，冊2

鄭文寶，《江表志》，四庫全書，冊464

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校印本，1969），冊14，15

夏承燾，《重校陽春集》，附於王次聰，《南唐二主詞校注》（台北：世界書局，1965）之後

無名氏，《江南餘載》，四庫全書，冊464

《欽定全唐文》（台北：鼎文書局影印1814年版），冊3，卷128

吳宗慈編《廬山志》（1936），收於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台北：明文書局重印，1980），第二輯

葛寅亮編，《金陵梵剎志》（1627），收入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前引書），第一輯

楊億，《景德傳燈錄》（1004序），四部叢刊（台北：商務印書館），冊32

陸游，《入蜀記》，四庫全書，冊460

陳思，《寶刻叢編》，四庫全書，冊682

闕名，《寶刻類編》，四庫全書，冊6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靜農，〈書宋人畫《南唐耿先生煉雪圖》之所見〉，《中外文學》，1975年，3卷，8期，頁8～17。

謝世涯，《南唐李后主詞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1994）

《欽定全唐詩》（1706），四庫全書，冊1423

李調元編，《全五代詩》（1780序）（台北：新文豐公司，1984重印）

唐圭璋，《南唐二主詞彙箋》（1937初版，台北：正中書局，1966三版）

唐安泰，《李璟・李煜詞》（北京：人民文學，1958）

葉嘉瑩，《溫庭筠、韋莊、馮延巳、李煜》（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

鄭騫，《從詩到曲》（台北：科學出版社，1961）

趙崇祚，歐陽炯，《花間集》，宋紹興本，附李一氓校，李冰若注（台北：鼎文書局，1974）

姜尚賢，《溫韋詞研究》（台南，1971）

劉金城，《韋莊詞校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其後附有夏承燾，〈韋莊年譜〉

徐鉉，《騎省集》，四庫全書，冊1085

劉承幹，《南唐書補注》（1795序），嘉業堂刻本

王堯臣等編次，錢東垣等輯釋，《崇文總目》，叢書集成，冊12～15（台北：商務印書館，1965）

高明士，〈五代的教育〉，《大陸雜誌》，1971年，43卷，6期，頁22～43。

李善馨發行，《中國書院史話》（台北：學海出版社，1985）

余輝，〈《韓熙載夜宴圖》卷年代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993），4期，頁37～56。

宋徽宗敕編，《宣和書譜》，四庫全書，冊813

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1059序）（台北：漢華公司據中央圖書館藏本重印，無出版年月）

林志鈞，《帖考》（無出版地，1962）

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四庫全書，冊872

Roderick Whitfield, *The Art of Central Asia* (London and 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83), vol. 2

郭若虛，《圖畫見聞志》，畫史叢書本（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

故宮博物院，《故宮書畫錄》（台北：故宮博物院，1965），冊2

楊果，〈翰林學士與宋代政治初探〉，收於鄧廣銘與漆俠等編，《宋史研究論文集》（河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7），頁49～76。

劉道醇，《聖朝名畫評》（台北：漢華圖書公司，1974）

宋徽宗敕編，《宣和畫譜》，畫史叢書本，前引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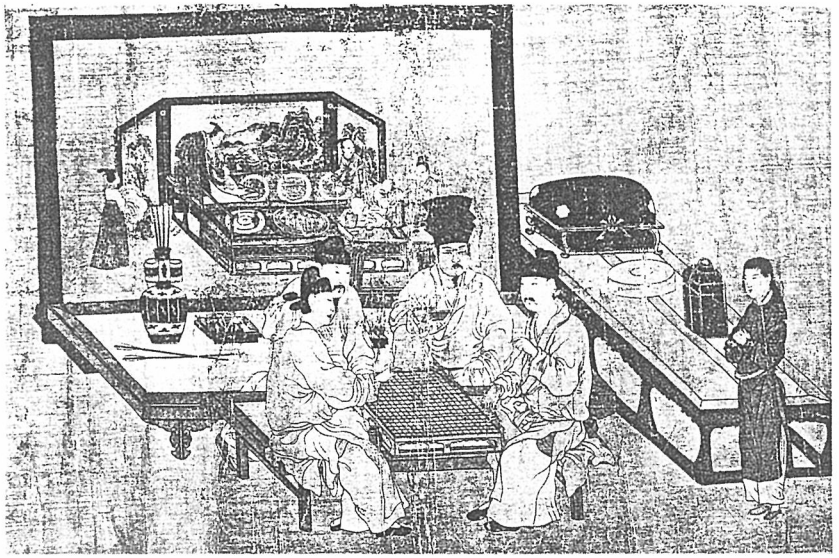


圖1　傳周文矩，《重屏會棋圖》，北京故宮博物院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圖2A　傳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2B　傳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